

常乃惠著

蠻人之出現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蠻人之出現

常乃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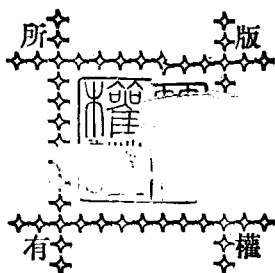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 十二月發行

蠻人之出現 (全一册)

◎ 實價 國幣 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常乃惠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澳門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柳啓新) (二一九九二)

自序

這一部「蠻人之出現」是集合近十年來若干篇發表過或未發表過的零星文字而編成的，就以其中的一篇題目作爲總題。我向來對於寫過的文字不知保存，現在要搜集起來也就不很容易，並且也似乎有許多篇並無保存的價值。現在，徵得得很，所能彙找到的幾篇也就是還值得有點保存價值的幾篇，於是設法印行出來，以作自己過去文字生涯的一點紀念。

我向來不會做小品文，對於現代幽默大師們所提倡的什麼「公安」「竟陵」之類，向來又多少存一點不敢恭維的意思。我總以爲文章做到了這個時代，世紀末的病毒已經中得很深，大家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機巧地，冷酷地，彼此挖苦一陣，結果冷笑而散，或者歎息而散，在這裏看不見一點光明的氣息，也看不見一點溫柔敦厚的精神。也許在少數領導者的幽默外衣之下，隱藏着無限的悲哀和同情，然而世上能了

解這種「微言」而學到的有幾人學「素樸」不成猶不失爲老實；學「幽默」不成則必流爲輕薄；輕薄的風氣在今日中國還有擴大宣傳的必要嗎？或曰：斯言也，乃衛道先生陳腐之言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則予欲無言。

予的見解既然如此，所以小品文一定做不好的，當然更沒有一點幽默的氣息，因此也必不得見重於現在的文壇；好在我並不會有意做文章，也不會夢想做文學家，更不會有意要出文集；當初寫的時候，祇是想到的便說；現在印的時候，也是檢自己歡喜的便印；有人要看與否，此書店老板之事也。何有於我哉？

這本小書雖然是隨手編成，大致也有一個問題做中心，在這十幾篇文章之中，所要討論的集中點就是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生死存亡問題。中國民族究竟還有出路嗎？中國的舊文化還有存在的價值嗎？新文化運動是成功了嗎？我們還有更新的，更光明的路可走嗎？這些問題都是稍有常識的中國人所一致要追問的。在這幾篇短篇文中當然談不了許多，然而未嘗不可以引起一點思索的端緒。對於這些問題，我近來的意見自己覺得漸漸趨於成熟，不久預備將個人的意見另外系統地寫出來，大約書的名

目就定做「我們的路」，在這裏不妨預先登一個義務的廣告。

這本書不是預備送給一般聰明過度的文化人看的；聰明人自有預備給聰明人看的幽默小品之類，在市場上多得很，不必我們來湊熱鬧。如果中國還有一兩個與未染世紀末病的蠻人，我勸他們買這本「蠻人之出現」來看看，管保貨真價實，恕不退錢。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著者

蠻人之出現目錄

自序

北京與上海

反動中的思想界

虛無主義與中國青年

論思想

因讀狂魔想到中國思想界

輓狂魔

寬容的態度與狹隘的主張

關於真理問題的一些話

前期思想運動與後期思想運動

房龍的『人類爲思想的權利而奮鬥的故事』

一

一一

一一

二五

三一

三五

三七

四三

四九

六五

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後.....	七一
荒原的夢.....	七九
民族精力與文化創造.....	八七
蠻人之出現.....	九七
中國軍事史序.....	〇九
從王光祈先生想到少年中國學會.....	一三
孟姜女哭長城.....	一七

蠻人之出現

北京與上海

『先至美國後至歐洲者，無不驚歐洲之局促頑舊；先至歐洲後至美國者，無不驚美國之囂塵雜亂』。這是飲冰室新大陸游記上的兩句話。到如今，在沒有到過歐美的人看來，「北京與上海」也許可以算作一個「具體而微」的實例吧。

本來從中古世紀跳入近代的文明社會，又要趕到近代潮流前去，是一件大大不容易的事。在歐洲人費了五百多年，美洲人費了二三百年的工夫，到現在還有一半沒有作完的，我們却想用二十年乃至十幾年的時率便追及他們，無怪乎「虛假」和「矛盾」的兩種現象到處都看得見了。

從挖山洞的生活到新式的洋樓，從二把手推車到摩托車飛機，從搖鼓游行的貨郎到先施公司，從三家村的夫子到東西洋的留學生，其間有一個共同顯著的現象是

什麼呢？——「矛盾」。住新式洋樓的人和挖山洞的人有大不相同的人格麼？開大公司的果然有完全的商業上的知識麼？戴博士碩士帽子的果然和歐美的學者有同樣的程度麼？從外表來判斷內容，往往使人陷入失望的深淵，這中間的毛病在什麼地方呢？——虛假。但虛假的內在根柢也還是矛盾。自我的矛盾，外表和內容的矛盾，固有的和後加的矛盾，都是產生虛假的原因。總之，矛盾是代表一切從改革以來到目前乃至以後二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外過渡時代中國各種現象的總名稱。極端的矛盾此刻且不必提起，只就似乎相近而實際矛盾的兩個社會來說吧。

我們一談到「北京」與「上海」立刻便聯想到歐洲十四五世紀時社會一般的現象，那時支配歐洲社會的有兩個大原動力：一個是歷史的，傳統思想遺留下來的帝王，諸侯，貴族和武士等；一個是新興的，平地起來的市民階級。這兩個階級各有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根據地。代表前種勢力的是君士但丁堡、羅馬的古老的城堡，代表後種勢力的是佛羅靈、威尼斯、漢堡、伯來曼等新出現的都市。這兩個城市各有不同的地位、背景、和維持生活的方法，所以產生的社會文明也就各不相同。這兩種文明各各保

存發展下去，一直到近代，變成兩種各自完全獨立而又互相利用的型式，形成十九世紀文明的總根源：這便是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第二階級與第三階級，大陸式與歐美式政策分別的來源了。

人類歷史進化的過程本來是相差不遠的，歐洲不過是一個比較顯著一點的例，在歐洲以外還有許多國家從中古走到近世，從半開化走到文明，一樣地要經過這幾種階段，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們試打開二十年來的中國維新史來看，可以發見處處都有這種顯著的進化過程的痕跡，而拿北京與上海來作說明的例，是最好不過了。

在北京住久了的人，一初到上海，有一件最刺目最能引起奇異和不快的感覺的事情，便是滿街貼着的「戲目」問題，「狸貓換太子」，「諸葛亮招親」，在聽慣了「賣馬」，「空城計」的北京人眼光裏看來，究竟算一回什麼東西呢？然而在上海戲院裏却一回一回的引動滿座的觀客，這事若不從生活根源的地方去推想，則上海人的心理真正不可解了。倘使我們拋棄一切主觀的成見，根據事實的真理來推想，我們可以曉得「空城計」「賣馬」之在北京，與「狸貓換太子」「諸葛亮招親」之在上海，

都各有他歷史的環境的根據，而最大根據還是在生活問題。北京人因為歷史的關係，二簧輸入最早，根基也最深，這種舊戲怎樣會輸入的原故我們不大明瞭，但其所以能够盛行的原因，不能不推之於前清宗室貴胄子弟的獎勵與提倡。八旗子弟在前清時代生活上原佔一種特殊的位置，他們生下來既不要自己勞動，自有人供給他們的衣食，於是整天除了提鳥籠子繞圈兒之外，自然不得不聚精力於戲劇的娛樂了。戲劇是應民衆生活的需要而發生的，民衆生活既然是一種優游涵裕的生活，則所要求的藝術自然也要紆徐曲折耐人尋味，不歡迎明白顯著或急促刺人的節奏，此北京的戲劇所以拋了景的方面而專向聲的方面發展，而聲的方面又捨去激烈的梆子而專發展「紆徐的「二簧」的原因了。

至於上海方面的情形則又不然。上海在外表上完全是一種近代都市的形式，他沒有北京那樣悠久的歷史根據，沒有那樣優游涵裕的貴族生活。誠然，上海也有一般新興的貴族階級，資本主義的貴族，他們的生活也可以算作優游涵裕；但這種優游涵裕是從震驚刺激裏出來的優游涵裕，是大風濤裏暫時的休息，是煤氣燈光底下暫時

的安眠，因此他們的娛樂需要淺顯更淺顯，免了多費那疲倦極了的腦筋；一方面却又要刺激上加刺激，才可以使那疲倦極了的腦筋從新興奮起來，這便是「狸貓換太子」，「諸葛亮招親」一類的戲，所以能設在上海發達的原故。

我們再說一件普通以為較為重大的事情吧：凡是在北京教育界稍微在過幾年的人，一到上海，一定都會感覺出這兩個都會的學校性質有一種不同之點。北京主要的學校是官立的，上海主要的學校是私立的，北京學校的主動力在教育官廳，上海學校的主動力在校董；北京學校是官僚的，上海學校是資本家的；北京學校是命令式的，上海學校是廣告式的；北京學校受日本影響最多，上海學校受美國教會影響最多；總而言之，北京的教育是大陸式的教育，上海學校是英美式的教育。

這個原因我們可以說明如下：近世教育自然的趨勢，本有大陸和英美兩派，而過去二十年中國所採的教育方針却是自然的毗於大陸派；那是因為地理上、歷史上、國民能力上的種種原因，使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能不首先和日本接近；日本的教育制度是從德法學來的，是純粹的大陸系，因此中國從他那裏轉販來的制度一切，自然也不

能不偏於大陸系。其實教育由國家發動，根本已屬大陸一派了。這種教育制度的精神，無論其能貫徹與否，要之在政府所在的國都裏面，當然所得的影響要特別重一點。北京的學校這種色彩格外加濃，原不足怪。

至於上海，原非中國勢力所及之地，官辦的教育在此地影響很小，然而上海却自有他的教育統系和精神；有幾個教會學校，其產生還在政府改革教育制度之先。上海的教育以教會為先驅，以資本家為後盾，他的色彩當然是另一種色彩了。

頭腦比較清晰一點的人，一定從此可以想到北京與上海的異點還不止戲劇與教育兩項，這不過是偶然舉出的一兩個示例而已。所沒舉的事情還有多少，若是請專家研究起來，一定還有無數同樣的發現。就是北京的都市完全代表軍國主義（或官僚主義）的社會，而上海的都市完全代表資本主義的社會。其根本的原因是在：北京的都市裏面有幾十萬人都是直接或間接的靠政府官僚吃飯，上海的幾十萬人却是直接或間接的靠中國或外國的資本家而吃飯的。

這種現象我們倘若能得到正確豐富的材料，用統計學的方法列表出來，一定還

可有更詳細的發現。譬如報紙一項，在北京大多是靠政黨官僚直接或間接的津貼而生存的，在上海大多數却是靠廣告等營業上的方法而生存的——雖然也有受津貼的時候。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的來研究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將來的趨勢是怎樣？

我敢說，雖然上海的戲劇，雖然狸貓換太子一類不通又不通的戲劇，在老北京的戲迷家看來是豈有此理之極的，但在最近十年或二十年之內，北京的舊戲必有完全被他征服之一日。現在已可以看出這種趨勢來，前幾年的「家庭禍水」「壹元錢」，近一二年的「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戲之能在北京風行，這便是北京人漸趨向於「外江」化的一種徵兆。這個原因也很簡單：上海的戲劇無論怎樣的荒謬絕倫，他總是平易的，直觀的，屬於一般平民的；北京的戲劇無論怎樣的規矩謹嚴，他總是狹小的，艱深的，非內行人聽不懂的。貴族的文化將被平民的文化征服，是必然的現象，戲劇是民衆最重要的娛樂品，他的表現尤其明白而正確。要之，生活競爭劇烈了，北京人也不容還保有向來那種優游涵裕的態度，他們也一樣要求平易而且激烈深的娛樂

品，使他們能用最小的勞力得到最大的興奮。易卜生一流的問題新劇所以不能在社會流行的原故，也可以用同樣的道理解釋。社會所歡迎的不是講演式的新劇家，却是直接可以刺激觀感的景色和動作；真正的新劇家，不是要只管研究劇本，所當研究的，乃是文字以外的舞臺建築，布景，分幕等等事情。

同樣在教育方面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將要壓到軍國主義的一種趨勢。近幾年來北京教育界的現象可以用「鬧風潮」三字表示出來。所鬧的風潮大約說來不外兩種：一種是對內的，那是學生對教員的不信任等；一種是對外的，即是教育界和政府的衝突等。對內風潮之多，表示北京式的教育已經不能令學生滿意，實在說起來，即是對日本式的教育厭棄的一種心理表現；而轉過來說，上海的學生風潮比較起來尚不多，即是表示美國教會派的教育尚未被一般人所厭棄的一種現象。至於對外風潮之擴大，更可以表示政府無力維持教育，教育界不信任政府，即是軍國主義教育制度根本破產；而同時產業的發達，新資本家的興起，商教兩界的聯合，請求學校維持學校的動議，都表明一種新興資本主義下的教育制度將要一飛冲天的樣子。本年暑假中國

立學校和私立學校招生的消長情形，更可以表明北京教育界的一大轉機。此後十年二十年之中，國立的學校將要奄然而自滅或者轉蛻一種新的形式，資本家作主動的學校將要繼續的興起，上海式的教育將取北京式的教育而代之，全國之教育或者被教育者將要膜拜屈服於資本家的鼻息之下，這是已經造定的形勢，不可倖免的。

這一種消長的情勢，雖說直接表現在北京與上海兩個地方，但根本的動力是要算在太平洋以東和地中海以北。簡單的說，歐洲大戰，實在是解決這一個問題的總樞紐。許多人說：歐洲大戰是資本主義將要衰落的一個表現，這話實在錯了，歐洲大戰只是資本主義打倒軍國主義的一個戰爭，失敗的只有軍國主義的俄德奧三國，至於資本主義的英美不但不倒，反而更加強盛，現在便說資本主義的末路，至少還早二十年吧。這二十年内，世界的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還大有發展的餘地呢。

這樣的發展，資本主義驅除軍國主義的發展，於我們的前途有利呢？有害呢？這話很難回答。可以分兩層來說：第一，無論將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怎樣的發達，進步，若想靠他達到改良中國的目的，最小的限度使中國社會此後再不引起非常的擾亂是辦不

到的，因為中國未來的資本主義和已往的軍國主義一樣，是虛假的，表面的，無力而不完全的，將來的結果只有壞一方面沒有好一方面。試問現在的上海除了具備一切資本主義都會的惡德以外，他的好處在那裏呢？本來一二十年的努力要追及人家幾百年的成績，當然不會完善的；因此縱然歐美的資本社會能毀自然的，順序的，平和的，變化到新的理想的社會，而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決不能希望如此的。第二，資本主義不能希望藉他達到我們理想的社會，然而他確是一種必然不可避免的階段，往理想世界走的人不能不先經過這個世界。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有努力縮短他的期間，促進新文化的出現，却沒有能力去消滅他。

人們站在北京或上海的都市而目光將遠注將來；在資本主義的鐵鍊底下而不因此裹足不前；已往二十年的工作，既因我們的努力而小有成就，未來的時間長短如何也要準我們的努力而定。北京式的社會可以變成上海式的社會，上海式的社會難道不會變作一種新的樣式的社會麼？這是我走過北京與上海之後發生的一個問題。

——民國十年十月二十日，時事新報學燈——

反動中的思想界

四月二十三日晨報副鑄上，仲密先生有一篇「思想界的傾向」，我讀了頗發生幾點感想。一種思潮流行之後，繼起者必爲一種反動的思潮，這已成歷史上的常例，且可用社會心理學來解釋，是無容人懷疑的。兩三年來報紙雜誌上也有許多人驚告說：反動思潮快來了，大約大家都感到這一種不安的情兆，不過反動潮流究竟是什麼一個性質，却終於沒有人明白說過；這似乎總還是大家對於晚近新思潮的趨勢不曾精細研究過的緣故。仲密先生在這篇文章裏，他指給我們「學術」、「古學卮言」一類的東西，便是這類反動思潮的代表，又告我們說「國粹主義」，便是反動潮中的唯一傾向；我對於國粹主義固認爲是反動思潮的出發點，與仲密先生的意見相同；但覺得他所舉以代表反動思潮的幾件事實，却還不盡贊同。我以爲這一類淺薄的東西似乎還不足代表反動的主潮，若求真正雄偉的反動潮，還須求之於這些事件以外。大凡一

種思潮盛行以後，繼起的反動思潮若能成立的話，至少必具有兩種條件：第一，凡以前新思潮所具體攻擊過的東西到這中間都沒有了，第二，凡這種反動思潮所含的缺點都是以前新思潮所沒有直接具體攻擊過的。因為人們雖是不長進的東西，但表面上誰也不肯承認自己是不長進；脊戀骸骨雖是人之通性，但沒有一個人肯自己揭破自己所眷戀的是真正骸骨——此所謂人們是指受過新思潮一番洗禮的人——若是經過明白攻擊以後而還要重擡出來的偶像，沒有一個不立刻便會跌倒的，張勳的復辟便是一個好例。試看現在的某雜誌出版以後，對於新智識階級中果然有多少影響呢？曉得這種照抄老卷的舊法子是不會成功的，我們也就不必太杞憂了。

然則真正的反動潮流在那裏呢？我以為恐怕要在新思潮內部去找才行，我們要曉得這個道理，大可以拿民國三四年間的政象來看，繼元二新潮之後而起的反動復古運動，主其事者並不是食古不化的遺老，而反是嶄新的維新人物。勞乃宣、宋育仁輩的復辟並不會惹起多大影響，而制禮作樂的大業反都出在一般革命黨、立憲黨、東西洋留學生之手，這其間的緣故大可以深長思了。大凡一種反抗舊思想而起的新潮，斷

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幾千年來支配人們腦筋根深蒂固了的固有勢力，僅僅靠幾年中的口紙宣傳便希望可以澈底澄清，這差不多是出乎人類能力以外的事情。凡是一種新潮初起，如果與社會環境的變動相應，有發育成功的可能性，則必能蒙一時的歡迎；這是因為社會中幼稚的細胞富於感受變動的力量，故每能順應新潮的趨勢，新潮之所以能驟起而即流行者賴此。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凡是新起的一種思潮，在社會分子思想中所佔的成分必定是極少數的；大部分固有的習慣權威宰制了幾千年人類的心理，斷不是短少時間所能奏肅清之效的。舊思潮的偶像雖然打破，舊思潮的實質仍然存在。初時懾於新來的勢力雖然暫時屈伏，但根蒂是在人心裏的。一等到時機到來，乘着這種「厭故喜新」的人類心理弱點仍然是要出現的。然而這種出現決不是簡單的一往一返，若止是一往一返，那麼人類的思想便永遠沒有進步的可能了。故新出現的反動潮，必定與新思潮未出以前的舊思潮有許多不同之點，最初的不同點大約就在名與實這兩端上，反動的最初式樣大約都是把虛名讓給新思潮而舊思潮則居其實際，以後經過幾次的「反動的反動」之後，實質才會慢慢變化

的。我們欲求反動的主潮，還須於這種「掛着新招牌賣舊藥」的潮流中求之。

老實不客氣地說，這幾年的思潮改造運動的結果，真正能澈底了解西洋文化的真面目與它的需要的，我覺的除了極少數一部分人以外，仍然是很少見的。即是那極少數一部分人的思想也顯然不是受新思潮所造成的，故新思潮運動的結果竟可以說影響微末之極。此外如主張東方化的梁漱溟先生倒確是認識一部分西洋化的面目的，即如他說西洋化的根本精神是在「大家都要爭權奪利」，換一句話便不是現在一般掛着「人道主義」、「大愛主義」、「無抵抗主義」招牌的新學士們所能了解的。我常常想，歐洲的思想變動可惜走的太快了些，於中國實在不見得有什麼好處。中國人本是從十八世紀以前才覺醒了的人，一睜開眼便看到十九世紀的光華燦爛的世界，還未曾到下床學走路。人家已經揭過一篇又走到二十世紀上來了。恰好新揭開的這一篇又頗有點投合中國人的習慣心理。人家是工作完了才想休息的，中國人却只看見人家現在的休息而看不見人家從前的工作，因此別人的睡眠是勞動後應有的休息，中國人却是祇有休息沒有勞動，結果便弄成睡了又睡長眠不醒的懶漢。這樣

的學外國人可謂外國人之不幸了。若推求他的根本原因却不好怨外國人，只是中國人懶惰的舊根性太深了些，只想揀自己合脾胃的事來做，結果當然變成了新招牌底下的舊貨攤了。

這樣新招牌底下的舊貨攤我們試就現在流行的新思潮中舉個例來看看，好在我們是討論學理，並非攻訐個人，諒該不至於得罪人的。

就政治方面看，現在新人物中流行的一種態度是「不談政治」。打破政治救國的迷夢而從事社會事業原是好現象，不過「懲羹吹壺」，結果連政治二字都視為與己無關而絕口不談，這却只有東方人是這樣的。本來因為政黨的私爭而遂厭惡政黨已經是很好笑了，甚至而厭聞政治，那簡直想不出是什麼理由。民八五四以來的學生運動確是國民改變態度的一種好現象，不幸到了現在這種精神也被「安心向學」四個字漸漸壓下去了。我敢說大部份自命為不談政治的人，他的動機出於懦弱之一念——自然極少數的真覺悟者不是如此——因為談政治是要與現實社會接觸的，即使用不着奮鬥犧牲，至少也必下種種實際觀察的工夫才能發議論；至於文學，哲學，

藝術，科學，却只要坐在房子裏讀幾本書甚至一本書不讀便可以憑自己的天才杜撰出來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是如此，談社會主義可以遠想將來的美滿社會，但是怎樣達到這種社會却不見有人貢獻妙策。大家談社會主義都是坐着等奇蹟光臨的態度——自然也有少數真正實際奮鬥的人，即使是驅使別人去奮鬥的，也總比高談而不動的人強。——西方的社會主義是不得已而大家搶飯吃的手段，中國人的社會主義却只有幾個書生吃飽了飯沒事做的夢想，不懂得「爭權奪利」的真精神而談社會主義，那只好請三皇五帝爲我們劃分井田，請列寧爲我們分配麵包，永遠造不成自己下手搶的機會。總之，「不談政治」的態度實是中國人漠視現實精神的一種表現，這是幾千年專制政體下養成的結果，與西方人的民治精神相去不啻天淵。中國爲什麼被稱爲愛和平的民族和世界主義的先進國呢？我敢說因爲中國人是懦怯的原故。這豈不是掛着新招牌賣舊藥的一種麼？

再如學術界或哲學界的一般思潮，除了「準遺老」「準遺少」的舊式哲學家宗教家不算外，稍爲致力於西洋哲學的人自然都不肯承認自己是掛着新招牌賣舊

藥，但是真正不揀合中國人脾胃的東西來介紹的又有幾個人呢？羅素可以說是西方化——分析的精神——色彩最濃的一個哲學家了，但是他到了中國一年，却祇聽得「靈性生活」「創造衝動」等吵得不可開交，「社會改造原理」「到自由之路」等繙譯出好幾本，但是是一部「數理哲學」的名著却連找一個勝任繙譯的人都得費許多力量。西方近代的哲學家像柏格森、羅素之流沒有一個不是在數學物理上用過功的，中國人却只曉得介紹他的「直覺」「冥證」「靈性生活」，雖欲謂爲非由於逢惡護短的心理，不可得也。

再轉過頭來看一看最時髦的文學潮流。寫實主義提倡了幾年，沒有看見產生出幾篇寫實傑作，而差強人意的創作，却都脫不了「愛好天然」的色彩。這便是中國人懶惰和懦怯的精神的一種表現。自然界也許是可愛的，但是我不信社會上的罪惡會被自然美遮得那樣一點看不見。明明是臭水滿溝的街市，却硬要說是有真樸的趣味；明明是做了十幾點鐘一天的汗血工作還不得休息的貧民生活，却偏要羨慕他們是快樂的天使；這純是中國人和自然融樂的精神，然而表面上却扯的是歐化文學的旗

號。據我看來，因為文學在現代中國思想界最佔勢力的原故，故反動的潮流在這裏邊也愈看的分明。如近來俞平伯先生的「詩的進化還原論」以及由此產生的「雲皎潔，我的衣」一類的詩，以及郭沫若先生的「古事劇」，都可以代表這種反動潮流的見端。俞、郭二先生的思想固然是很前進的，這幾本著作本質的好壞，我不是文學批評家，姑且存而不論，不過從這一派入手的學者不善學之，必有入於純粹復古的一日，却是難免的。因為既承認「雲皎潔」等三字四字一句的押韻詩是音節鏗鏘，則舊體詩詞的格律聲調當然無庸反對；既承認改本西廂是有新文學的價值，則照譜填詞的原西廂又何嘗不可以做作；這都是國粹主義將來的預兆，或者已經來了。

此外呢，許多瑣屑的事情也可以看起新智識階級眷戀骨骸之情來。鼎鼎大名的晨報副鑄，却捨不得把那古氣盎然的「鑄」字去掉，換上一個又好寫又好認的「刊」字；許多新文化出版物封面上總要請書家寫一筆好魏碑的大字；作慣了白話的人的私人通信總還要加上幾個「之乎者也」的話助詞——我也是犯這病的——這都是不勝眷戀故舊之情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再進一步說，四五年來的新思潮所以能勃然而風行者，未始不是大有藉於這種「舊式的態度」。因為中國的精神向來是籠統的，調和的，決沒有極端地拒絕任何一種思想的事情。近幾年來輸入的西洋化是偷生在這一種態度下的。根本的態度不變，自然建築在表面的一切新思想都是靠不住的，目前雖然是轟轟烈烈的思潮，反動力一來，便只有冰消瓦解了。

總之，仲密先生的杞憂我是承認的，不過他所憂的幾件事却未免有點真是「杞憂了」，可憂者還不在此。「著古衣冠，用古文字」雖然是不會有的事，而好奇之情一變而為人家不懂自己也不懂的未來派表現派文學，却是難免的，「參禪煉丹」是只有同善社一類的人才去作的，但新智識階級却另有他的「直覺」、「冥證」、「精神生活」；駢文、律詩的復興想來也是不會有的，然而有了目下一般「風花雪月」、「哥哥妹妹」派的新詩也就很可觀了。這都是可以杞憂的事情，而且也還不僅是杞憂

現 出 之 人 變

虛無主義與中國青年

我覺得中國的青年——尤其是中學校裏的學生——近來漸漸有一種消極地否認一切的現象發生，這個現象，據我們頑固的腦筋看來，終覺着是很可憂慮的。大概從各國革新的歷史途徑看來，這種趨勢似乎也是不能免的。只要對於舊的思想制度取了根本懷疑的態度以後，很容易地第二步便會走到這條叉路上去，而在東方民族或染了東方色彩的民族裏，尤容易發生這種思想，如四十年前的俄國便是最好的例。至於中國，因為幾千年來老莊哲學的毒質受的太深的原故，這種思想態度尤其容易一觸即發。根本的原因是由於思想界一般的標準太低，浮淺的議論到處被恭維爲湛深的學理，結果引起兩種趨勢：腦筋太混亂的人，看了現在的情勢，於是以為所謂科學文藝之內容不過如此，那麼，只要是我腦筋中所想到的東西便不妨拿來著書立說，廁身著作之林，以妄人的資格發爲妄論，恬然不以爲恥，甚至居然有以互相標榜的心

理大肆其恭維的。有了這樣的著作家，再加以這樣的批評家，於是隨便什麼中等教育還沒有完足的青年，便都可以發刻詩文集了，日記雜感之類，也可以出版。算是文學的創作了，八卦五行上天下地亂混一陣，便可以算是哲學家了，經濟學還未入門，便要主張共產主義了，普通心理學還未學過，便主張什麼人性本善的無政府主義了。實際的事業方面也是如此，坐過三天半的優待室，便算是下獄的志士，在鄉間過上幾個月，準貴族的生活，便稱為到民間去的覺悟者。固然，這些志士，覺悟者，究竟比一點不覺悟，一點志氣沒有的人，總算還強些，可是這樣淺薄的思想，脆弱的行為，若可以被當作是新文化的代表，那麼又何怪國粹主義者要擡起頭來大罵什麼「吾國今日國民性之弱點，可謂發露無遺」了呢？以上一派人與我們所指的虛無主義無關，姑不必深論。此外還有一派，稍知自愛的人，也曉得自己的根底淺薄，不敢來發抒什麼偉論，不過卻也同樣的受了暗示，看了目前的所謂科學文藝者，不過如此，因為誤以為科學文藝的本身，也不過如此，結果遂發生否認一切的思想；這種思想之發生，較前一派尤為危險。我們常見有許多人研究什麼「空間之外時間之前究有何物」，而沒有結果，於是懷疑科

學的價值；有些人要問二加二等於四是什麼理由，有些人開口便講人生有何意義？結果科學都不能回答，於是科學便被歸入無用一類了。本來這些問題不是絕對不可解釋的，但是連普通科學常識都沒有的人，請問對於這種問題的答案如何能够了解？試問「物的分析」、「物質與記憶」之類的理論現在的中國人有幾個能看得懂？於是結果自然造成一種消極的妄論，而重新撐起消極主義的中國的本來面目，以我看來，這是最近的將來反動思潮中最可怕的一件事。

怎樣挽救這種自殺的青年？怎樣防止我們自己不要走上這條自殺的路上去？有什麼補藥可以醫治這種虛度的誇大狂？這是目前我們最急於要研究的問題。

我引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來哀告諸位提倡新文化的先生們！
「救救孩子」們罷！

——十一年六月廿二日，學燈——

現 出 之 人 體

論思想

思想的定義便是思想，它決不是行爲，它也決不會變爲行爲。

因此能設思想的人，他未必有能設實行的能力，實行是實行，它也決不會由思想而產生。

至少，中國民族總是一個長於思想的民族，不必由林玉堂先生來指導着什麼「怪話」「漂亮話」之類，我們的青年和他們已往及現在的祖宗一樣，早已學會說各種漂亮話，怪話……及其他在演講臺和飯廳上可以應用的話，這即使如羅素的老實人也可以看出來的。中國人的生活無處不表出富有思想的民族的色彩。態度之雍容紆徐，言語之迴環曲折，這正是表現出五千年來屢經在異族的馬蹄下苟延殘喘而積得的經驗是何等影響于人生。中國民族的可愛的魔力，大約總在此。

然而無論怎樣味着良心來說，我總不能說中國民族是可畏的民族了。無論如何，

我總覺得中國人的思想、學說、信條、主義，祇是拿來做講臺上、飯廳上、以及各種交際場上談話的資料用的，無論如何決不會與實際有了關係。噴壺的用處只是澆花，它也決不會變而澆地的。

卽論思想，原也有以此擅長的民族，日耳曼民族便是這樣。康德的批判哲學表現出德國人是何等擅長於思想的民族？但中國人的思想因爲只是應用於食桌上之故，他決不需要如此複雜精密，他所要的只是不求甚解。當做消食劑的中國民族中的所謂思想，是與日耳曼人原來大不相同。

到現在我不得不懷疑吳稚暉先生的譯書幾十種可以救中國的話。我們只覺得天演論到中國有了幾十年，但實際上並無一點反響。雖然也有人說三月一回的督軍遊戲是進化學說所造成的，但我們曉得六朝、五季之時，進化的夢尙未出來，我們民族偉人間的遊戲已經鬧得不得開交，這干達爾文、赫胥黎、嚴復、鳥事？便是杜威、羅素、杜里舒連貫而來，除了幾席大餐造就出幾個會說漂亮話的小偉人，小名流外，還有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也不過是游行時的口號一種，勞動運動也不過是筆尖上的名辭一個。我

現在對於一切主張也不痛恨反對的，也不歡迎贊成的，只要深深看透了中國人的贊成與反對都不過是戲臺上表演方法的一種，便可知越是兩下裏面紅耳熱不得開交的時候，越感覺得有好戲可看。至於戲散以後何嘗有什麼恩仇勝負之可言？還不是主張禁烟的依舊可以販土提倡和平的照例還是構兵，這樣的觀察法古人早已發明多時，所以哲人們高唱「如夢幻泡影」的偈語以自寬解，但即使高唱「如夢幻泡影」之句也仍祇是高唱而已，決不如印度聖人之飼虎餵鷹將身作餌，這正是中國民族的特色。至少大部分的人是如此的。因此縱使譯書萬種，不過徒災梨棗，要使影響於實際是萬不能的。

我向來對於中國民族運命毫不悲觀，但現在却感覺到也並無樂觀的可能了。即使倏倖打倒某某強盜，收回某某地方，於我們民族未來的運命可有什麼增加？也不過在奄然就滅的長途中作一回光反照而已。什麼文化運動，思想運動那更是不過那麼一回事了。

在我的唯物的頭腦想來，中國民族前途惟一之希望是在從血統上改造民族，把

野蠻粗豪敢於實行的民族的血灌輸到我們老大優柔的古民族的軀殼中。和歐洲人結婚自然是一種方法，但除了被他征服以外這樣事情在驕傲的白種人看起來是不會俯就的；只有就我們自己民族中着想是較容易辦到。我們所謂五族共和之中，漢滿兩族最爲無用，蒙族尙有一半可取，回藏二族則可希望之點甚多，尤其可愛的是回人。縱使西路回回不必是阿剌伯民族的遺種，但謨罕、默德聖人的教訓，大食帝國一千年前奮鬥的偉績，土耳其，阿富汗人在現世的血戰，這些都使我們感悟可蘭經是一部最寶貴的經典，而伊斯蘭教是一個最可愛的教。我們應當提倡一種漢回通婚的政策，一面我們把豬肉暫時擱開，一面實行和纏頭女子去講戀愛，這樣才可以救我們的家族，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沒有訂婚的青年們注意些吧。

所以我的救國方略說出來只有這一點，雖然不免令思想文藝壇上的健將爲之失色，但實際確是如此。我以為與其譯一萬部書，不如造一條隴海新藏大鐵路，與其開一百個大學，不如修濬一條黃河。老實說，庚子賠款與其分給什麼國立私立大學小學做高等文牘的養贍費——此乃并非全稱肯定之辭，諸公不必動氣！真不如依吳大帥

的計畫去修鐵路，雖然我也一樣地不能染指。

中國文化的確太高了，現在還是盡驅國人入於山林受過八十年的野化再來講什麼文化不遲。如同裁兵的緊要一樣，裁學校也是緊要的。否則教育愈普及，文氓之造出愈多，漂亮話愈加漂亮，思想之表出愈巧妙，而民族亦愈趨漸滅。瞻望前途，實不勝戰慄憂危之至。

——莽原第十五期——

蠻 人 之 出 現

因讀狂臆想到中國思想界

近來出版的定期刊物中，狂臆週刊要算是我認爲最好的了。這並不因爲我與狂臆的編輯者同是「晉人」，也不因爲我在莽原以及狂臆不定期刊中曾投過稿，更不是因爲狂臆的主張與我完全相合。我雖在狂臆投過稿，並且其中幾個人大致也都認識，但我並不是狂臆社員，而且彼此的思想也差得很遠；但我以爲狂臆是一個比較像樣的出版物，在思想界有一個新的地位。原故是：現在的思想界實在太沒人氣了，我們所看到的，而且在社會上很風行的，只有以下幾派：一派是教授名流們擺臭紳士架子的臭美，他一派則是含有刑名氣太重的陰險卑劣的無聊東西；第三派則是公子哥兒們北京飯店式的舞曲；這三種思想支配了中國的出版界；至少是北京的出版界。他們有一種共同表性，便是只會說漂亮，空虛，或者幽默的話。因爲根本沒有真實的東西，所以無論說話或是罵人，總之只顯露出中國士大夫階級苟且偷竊的心理來。他們中間

有的也許擁護中國的舊文明，有的正在詆棄中國固有的一切；但擁護者既不知中國真正的文明在那裏，而攻擊中國文明的人，他們自身却代表了傳統的中國民族中最卑污最畏縮的心理。

我之所以比較贊美狂飈，便是他們能毆走了直捷豪爽的一條素樸的路上去。一樣的罵人，直捷痛快便是少年的精神，也是中國民族未亡的一部分的精神；繞灣磨角，「但是」「不過」，用所謂「幽默」的態度放些半吞半吐的冷箭，這正是我們所要打倒的中國民族惡根性的一種；而不幸，這種惡根性在新紳士階級中與在舊紳士階級中所含的一樣的多。狂飈不滿我意之處也很多，他們不懂科學而強來提倡鼓吹科學，倒不如老老實實談出版，談戲劇，較為忠實；但無論怎樣，他總比新紳士階級「幽默」較強。

在現代，我們民族的思想界應當怎樣走去，是一個很費籌思的問題。我們固不要學章士釗式的盲目地崇拜古聖賢之道，我們難道僅僅學了疑古玄同式的盲目地歡迎歐洲新文化就夠了嗎？中華民族未來的命運豈不是要從「國粹」與「歐化」兩

層壓迫中解放出來，而又要從「國粹」與「歐化」中選擇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才能有復生的希望嗎？然而，在做這件工作之前，素樸與真誠的態度是第一件必要的，也是最後必須的。幽默式的士大夫思想，大可以「成功者退」了。

——十六年一月十六日，世界日報，學園——

現 出 之 人 體

輓狂魔

不料我剛作讀了「狂魔」一文之後，狂魔疾終于上海正寢的計聞隨着就送到了。本來狂魔的不會長命百歲，是我們早已料到的，但是天折得這樣快，却確乎「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當着與「思想界的權威者」正在宣戰的時候。多心的人也許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策略上面。「這話當然不確」。不過自由批評家所走不到的光華書局，思想界的權威者也許竟走到了；於是乎狂魔乃停，於是乎狂魔乃不得不停。但當今之世，權威亦多矣，狂魔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強敵？北方之強敵？抑而強敵？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魔雖停，而長虹終於能安然走到北京，這個，我們要向長虹道賀。

嗚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轟轟烈烈之際，則有五教授慨然署名於擁護思想自由

之宣言，曾幾何時，而自由批評已成爲反動者唯一之口號矣。自由乎！自由乎！自由乎！其隨線裝書以入於毛廁坑中乎！嘻嘻！咄咄！

——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世界日報，學園——

寬容的態度與狹隘的主張

在從事討論任何問題之前，自己對於一切問題所應執的態度如何，似乎也是一個切要研究的問題。

「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這句話真不錯。我們現今論學論世，往往就感覺這種痛苦。一種主張或態度，用一句話想要完全表明出來總是不能盡的，因為你的話倘若側重了防止這方面的弊病，則結果就許又偏到那一方面去。

即如「思想自由」這一句話，豈不是一個天經地義誰也不能反對的原則，到如今誰也不能公然出來說這一條原則是不對的，思想是應該統於一尊的——雖然我在非宗教大同盟的聲浪最盛的時候，曾見過北京最高學府內的幾個學者公然發表過這種主張；——然而一方面尊重別人思想的自由，一方面就許有許多人誤會到是自己不應該發表反對別人主張的話，因為你妄想你以自己的主張壓到別人的主張，

這便是不尊重別人的自由了。這是何等可笑的解釋！

又如公平地批評一切的思潮，反對惡劣分子的如茵的生張，這似乎也是一部分願意做這事的人所應做的職務；然而又有許多人誤會是想要關閉口舌的自由，摧折青年的創造精神，有意圖包辦思想的嫌疑；這又是何等可笑的解釋！

不要看這些誤解是不相干的，我覺得有許多以前勇於說話的學者，到現在都抱了捫舌不談的態度，固然原因很多，但這些誤解也未始非其一因。只有我們這種用不着避誤解的嫌疑的人——因為沒有被誤解的資格——還可以自由地說幾句話。

我以為現在中國的思想界中不必怕有反動，這話是不错的，我們到了現在時代的人，總不該還抱有思想大一統主義的迷夢。因此無論國粹也罷，西學也罷，只要提倡者公然發表過一種意見主張，我們便不能不承認他這種主張在思想界中有了相當的位置和價值；無論位置怎樣的低卑，總不能不承認他是有位置的。但是「承認」與「贊成」却不相同，我們一方面雖然承認他有相當的地位，但如果他的主張與我們不同的時候，却不能不拿出全力來加以打擊。這種打擊是擁護我們自己主張時所必

要取的手段，不得謂之蘊斷思想。

現在中國思想界中的情形却恰恰與此相反，與我們不同的意見，便把他看作是卑鄙不堪，然而又不肯堂堂正正地加以攻擊。如果承認了這種主張是有正當的地位以後，却也即便連帶地加以無條件的贊成，再不看看他的內容究竟是與自己完全相合與否。這不但舊思想家是如此，即新式的，嶄新式的何嘗不也是如此。即如「學衡」的論調固然我們不贊同，但是究竟總不失為一種主張；若如那些滿口「梅光之迪」——等等的與學衡反對的文章，與上海墮落派文丐的口吻何異？這種論調據我看來比學衡還要低卑一層。平心而論，學衡之所以價值低卑者，不在其主張之頑舊與否。因為我們雖然不能贊成頑舊的主張，然而却也不能循例的說舊的即是壞的，故主張不同祇有加以辨駁，不必蔑視。學衡之所以低卑，乃在其對於新思潮評論之處，不向思潮之本身評判，而專向個人的人格下攻擊，這種態度實在是卑鄙的態度，以致引起「梅光之迪」等等的謬言，我們為維持公道起見，不能不認這兩面都是卑鄙的行爲。再說句公道話，「梅光之迪」等謬言固由於學衡自取，而學衡之所以出此態度，實亦主張新文

化的人有以啓其機；我們試回想起三四年前新青年上「作揖主義」，「答王敬軒書」以及同樣的文字，便可知現在學衡的師法源流所在了。所最不幸者，雖然當初首創人對於這種態度似乎已經悔悟是不正當了——因為他們近來已不常作這一類的文字了——然而社會上一般追隨的人不但不覺悔悟，並且還似乎以為這樣震動一世的偉烈豐功全靠這一類的文字才能奏效，於是大家羣起而心摹手追，惟恐其不似，連反對黨也都歡喜套這手戲來玩。時髦的文字不夾雜以罵人的字句則不能流行，罵之技術愈高則其文之行愈遠，流風所被，翕然同響；即如我自己便是受了這樣毒的一個人，並且屢悟而不能改的。從新青年而有學衡，從學衡而有「梅光之迪」等闢言，這叫做「冤冤相報，節節相纏」。從前梁任公先生曾說「革命之結果惟產生革命」，我却要套來說「謾罵之結果惟產生謾罵」。我以為我們在今日但凡有真悔悟的人，應該大家起來賭咒說：這種態度永遠也不準它出現了。

然而中國人却也奇怪，你要勸他不要罵人，尊重別人的主張，他便連帶地連批評的意見也不發表了，別人的主張便無條件地接受了，這豈不是件怪事！我以為我們現

在最要緊的是要把這「度態」和「主張」兩件事分開；態度是不可不寬容的，但主張却不可不狹隘。現在批評界中一般的情形似乎只曉得拿新舊作爲界限，凡是舊的——以形式定——不妨便自由地加以攻擊，但是對於打着新旗號的東西，無論他究竟的內容如何，却誰也不敢說一句話。這種態度也不是正當的。我以為我們在現在最要緊的是要樹起一種確信的主張，這種主張不怕狹隘，越壁壘森嚴才越可以杜絕假冒。我以為最好拿孫中山辦中華革命黨的精神擁護自己的主張。不但與我異派的我要攻擊，即名爲同派而實不相同的也要取斷然的排斥的態度，這樣才能澄清思想界的混濁，才能堂堂正正打出一條大道來。須知這種態度在政治上雖未免太狹隘，在思想界却是很適用的。至於所謂壟斷的主張者，只是對於表明自己的態度以及用言論批評別人而言，當然無所謂壟斷與否。因爲只有實際的行爲才能壟斷，若只是發表自己的主張而並且欲使別人信從我，這不得謂之壟斷。即使也叫壟斷，則這種壟斷也不算壞的壟斷。

我這篇意思，與東蓀先生所說「思想問題」大致無甚出入。不過再要補足幾句

話；東蓀先生說，「不怕反動，而只怕沒有反動」，我可以再加一句話說，「不怕反動，而只怕不能堂堂正正與反動黨來對壘」；這也是東蓀先生所謂「怕的不在復古派的反動蠶起，而仍在新派的自身不振」的意思。

五月十四日的晨報副鑄有一首短詩，題目叫做「不忘」，我至今還愛念他，如今仿着他的筆調來作一段我們的狹隘的主張的讚美歌罷：

「沉默者！

調和家！

我禁止自己不要理他，

我怎麼能數不理他？

.....
我只是這般孩子氣的天性，

我贊成的——我便要對他歡迎，

我不贊成的——我也要.....

——此文未發表過——

關於真理問題的一些話

真理大抵是沒有絕對標準的，或者即使有人也無從去知道他。

大約自有真理以來，世界上就無所謂真理之一物；有之，或者就是「沒有真理」這一句話罷。

其實，這也不是甚麼新發明，大抵萬事古已有之，不過在古來，說這種話的人，往往被罵爲「懷疑派」，而在今日，則被尊稱爲「實驗主義者」罷了。

自然，即使在現代，仍然有許多勇於自信和信仰一切真理的人，這種人大抵是成功者；他們相信一切真理是有的，並且是絕對的，應當擁護，執着，堅持到底。

因爲相信絕對真理的人這樣地多，於是真理的威嚴就越發樹立起來；於是應該一舉而殲滅的「異端」也就越多；於是「刀」和「火」的用途也就越廣。

「刀」和「火」大抵是與真理相待而成立的，從中古歐洲的異端裁判所，阿刺

伯大帝國的鐵騎起，一直到二十世紀中國的海陸豐——爲明哲保身起見，其他更直接的例恕不引用——一脈相承證明了真理和刀火是離不開的東西。無論所謂真理者，是聖母馬利亞，是阿拉，抑或是什麼階級之類，總之不信真理者就該殺，該剷除，打倒，或者屠戮。這是盤古以來一切真理信徒的天經地義，「天不變，道也不變」。

倘若天下的真理永遠只有一個，則事情到也容易辦些；不幸「人類生而是平等的」，和尙有創造和尙真理的自由，道士也有擁護道士真理的權利，本來實缺的真理只應該有一個，而候補的真理却這樣的多，既無輪流補缺的軌道可循，又無那個遇缺即補的優先條例，真理抉擇之途既窮，而人生之道苦矣！

於是因真理之出多，而刀和火之用愈廣，因刀火之用廣，而真理之出也就越多。在一切真理擁護者看來，這自然是最簡單爽快的方法，那個戰勝，那個便有理。而且事實上，你即使不贊成這個方法，你也沒有更簡單的方法去代替他；別人的刀火逼到你頭上，你還是終於不得不採用刀火去抵抗一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但刀和火能毀終於解決了真理的問題嗎？這個疑問不必我們用理論去回答，但

使將人類的歷史攤開來看一看；歷史上寫着的：從畢達哥拉斯（Protagoras）的被放逐於雅典，到加利來（Gallies）的火刑；從加利來的受刑，到廣東海陸豐蘇維埃政府的出現；人類，或者說真理擁護者罷，用着刀與火以及一切更鋒利更得力的武器，迫害，甚至屠殺一切異己的人，殺！殺！從亞當，夏娃睜開了他們的朦朧的眼起，用猶太人的算法，一直殺了六千年，所得的成績如何？真理是終於「定於一」了嗎？歷史上所告訴我們的，却是真理越來越多了，你亦一真理，我亦一真理，真理竟不是刀和火所能殺得完，燒得盡的。

真理擁護者到此不免灰心，以為世界是無望的了，於是「反動派」，「小資產階級」，出來貢獻一個較為容易辦到的方法。這個方法實在是很簡單的，便是勸一切真理擁護者把手中的刀劍放下，大家圍攏到會客廳裏來用口和筆來爭雄。戰勝者也不必殺人，戰敗者也沒有身首異處或者斷子絕孫的危險。大家舒舒服服，客客氣氣，戰勝者就暫時坐坐第一把交椅，戰敗者明年再來。

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就是「反動派」的自由思想。

最奇怪的是，像這樣一個簡單的方法，真理擁護者竟從來沒有想到，一直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犧牲了無數傻瓜的頭顱，才換到人權宣言的一篇正式承認狀。

更奇怪的是人權宣言的出現也有了一百多年了，然而刀與火的用途還終於不曾斷絕；而且在如今，似乎銷路更廣了，白臉進，紅臉出，在去年十二月裏來廣州唱的一幕戲上，這個證明是何等的更顯得確實。

無論是白臉殺紅臉也好，紅臉殺白臉也好，我們不懂得的是爲什麼除了刀和火以外，不許用其他更客氣一點的法子？爲什麼人權宣言發表了一百三十年，還會讓無辜的傻瓜接連不斷地送腦袋到真理擁護者的手上去？

這個謎無人能解，大約是終於不可解的宇宙的謎罷。

或者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想法。小資產階級者大都是溫和的，保守的，不革命的。真革命者殺個把人算什麼事，被人殺却也是當然。借着軍民聯歡大會的題目把一縣的紳士階級包圍起來全體屠戮，也是社會革命中一種當然的過程，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腦筋中所不能懂得的。不過小資產階級頭腦所不能懂得的革命手段，某某

某却在三一八，某某却在三卅一，某某却在一一二二的慘案裏先無產階級領袖而採用了。可見這也不是什麼新法，黃帝殺蚩尤時就用過這種方法的。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時代所給與人類的一點教訓，只是外表的各種巧妙，至於根本戲法還就是這一套；「狗抓地毯」，本性難移，人就永遠不會長進過。未來不曉得怎麼樣，過去和現在既不過如此，未來大約也只不過如此。

「不過如此」，這是讀完人類歷史後的一個總批評，這是我們一切人類在腦筋清醒時一種良心的供狀。

何時才有更長進一些的世界出現？大約只好找巖芙蓉去搖一回悶葫蘆再來回答這個問題了。

雙 人 之 出 現

前期思想運動與後期思想運動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曾經過了一個號稱『思想運動』的時代。

我們即使不滿意於這種運動，我們終久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運動；我們即使說這是不澈底不普遍深沉的運動，然而終久有一部分人努力的痕迹留在那裏。

現在，多數的出版家，多數的思想文藝批評家，就踏着這種努力的餘痕走上前去。而且，最近幾年來，政治上，社會上種種實際的變遷，不能說多少不會受了這種思想運動的影響。

我們的國民文化史上曾經有過這麼一段多少可以紀念的努力，這是我們所可以引為慰安的。

然而已經毀了嗎？我們的努力已經該停止了嗎？這是誰也要否認的話。

中國的國民自覺運動，文藝復興運動，僅僅在剛一黎明的時候，距離着光明的路，

不知還隔離有若干里之遠。海是這樣闊，船是這樣舊，我們的努力還需要得更多。

但是領導者却已經紛紛退却了。

有的人已經回到國故的墳墓裏去了，有的人已經回到愛人的懷抱裏去了。有的人已經回到大學教授的書齋裏去了；無論是怎樣一種回去——高尚或者不高尚，有目的或者無目的，——總之是一種退却。然而時代却是更需要我們向前戰鬥的時候。我們欽敬而且贊美那些一部分不會退却的勇士，在灰髮蒼蒼裏尚在掙扎的老勇士們，我們尊敬這些勇士們流下來的熱血或眼淚，給我們國民文化史上點綴成一顆顆兩顆的殘星。是的，我們應該尊敬他們，我們誠心誠意的尊敬他們。

然而，我們却也不能同意於他們的工作。

他們給我們的是一種消極的，批評的，破壞精神，這種精神我們承認是需要的，至少說在今日中國民族裏是特別需要的，然而我們以為還有更特別需要的東西；單是消極是不夠的。單是批評是不夠的，單是破壞更是不夠的，不是嗎？我們還需要有超乎消極，批評，破壞以上的新生力。

這是老勇士們所不能給我們的，或者他們不願給我們，或者他們壓根兒就沒有。雖然有人也可以這樣說，消極就是積極，批評就是建設，破壞就是創造，但是我們終認爲這是一種玄學上的詭辨。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些詭辨，而是真實的事實。

事實是明明白白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積極能產生積極，只有建設能產生建設，而且也只有創造能產生創造。

如果領導者不能給我們，就得需要我們自己去找。

不幸我們並沒有去找。

在最近的一二年中，有些淺薄的人們，爲事實的幻影所蒙蔽了的近視眼病患者，在一種朦朧的憧憬之下，渴望着思想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而應該有更實際的革命運動去代替了他。

不錯，無論是走到戰場去或者走到民間去，這都是在怯懦和浮誇的中國民族裏所特別需要的戰士，但是因爲這個理由便可以停止了思想革命的努力嗎？

或者因爲這個緣故，我們更需要有更深沉的思想上的努力罷。

現在呢？雖是至短視的人也應該覺悟了，幾年的實際運動結果只造成了舊酒盛在新袋裏的一種循環政變，政變只是政變，而結果思想也只是思想。

這不是政治運動者的恥辱，乃是思想運動者的恥辱，努力了將近十年的運動，結果還是於實際一無干涉，這是誰的罪呢？

這就是前期思想運動的下場——努力了將近十年的前期思想運動的下場。並且，事情還有更壞的。在世界一切國民覺醒的路上，思想運動常是與國民努力的方向離不開的；惟獨在中國，正因為思想運動的緣故，結果分散了國民獨立的戰線，移轉了國民努力的目標，延緩了國民解放的年代，在全體被壓迫的國民的共同進路上築起一條目所不能見的牆來。

要記着！這座牆並不是建築在物質生活和經濟條件之上的，乃是建築在虛無縹緲的唯心主義之上的。

正因為有了這一座唯心的牆，我們才聽到了屠殺又屠殺，感到了恐怖又恐怖，遇到了羞辱又羞辱。正因為這座牆，我們無數天真勇敢的青年才一個接着一個被殺，被

斬，被屠戮。

我們哀痛這些勇敢的青年，我們哀慟着因為這都是國家未來活潑的元氣，我們哀慟國家元氣的斲喪，我們哀慟像這樣一些勇敢的青年他們的頸血不灑在為國家獨立奮鬪的戰爭上，却灑在一種偏僻固執的唯心主義所造成的虛偽觀念上。

我們不能不說這些是一種犧牲，然而犧牲的代價是什麼？

犧牲的代價却祇是國民解放的路更延遲了，國民失却一致對外的團結力了，在朝的與在野的一切屠殺更普遍了。

難道思想運動的意義就為的是增加屠殺的勇氣嗎？

難道思想運動所要造成的就是這一班能親手屠殺自己同類的唯心主義發狂家嗎？

無論思想運動家這樣回答說不是，但是事實却已經造成了。這就是努力了將近十年的中國思想革命運動的唯一與實際發生關係的結果。

這樣的結果不如沒有結果，這是凡在屠刀之下逃出性命的人都可以發誓告訴

你們，或者還有許多死者的親屬也都可以向你們作證，然而這是誰的罪呢？

我不忍再追問這種罪惡的原始負擔者了，只好說不幸運的中國國民應該共同負擔着這種錯誤罷。

事情到了「碰壁」以後，就應該另換一個方向走路，現在是轉換方向的時候了。

前期思想運動已經「碰壁」，後期思想運動應該「轉灣」了。

朋友們！我們轉向那裏去？

我的唯一的答案是轉向超越過前期思想運動的路上去。

這句話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說我們鑒於前期思想運動努力方向錯誤的悲慘結果，我們應當向矯正過失的自戕的路上去走；另一個意思則是說前期思想運動所有消極的，批評的，破壞的虛無精神，我們應該起而以積極的，建設的，創造的實在精神去代替他。

這是我們所以需要一個更超越的思想運動的原因。

近代社會學研究的進步，證明了種族發展和個人發展的類似性：一個龐大的種族從野蠻的狀態進步到文化的狀態，猶如個人從嬰兒進步到成人一樣，先是從不自覺的意識狀態逐漸發展而成爲有獨立意識的自覺的成熟者。每一個種族或者民族，必要經過了長久的不自覺的時期，好容易才走上了自覺的路徑。就人類全體的進化過程說，一直到歐洲的文藝復興以後才算有了自覺的萌芽，一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有了將近完全覺醒的民族最初出現。中國雖是數千年的古國，然而幾千年以來民族的發展都只在一種半意識或者無意識的時代，離近代文化，民族自覺的意識狀態尚遠。辛亥革命或者可以說是自覺運動的開始罷，然而所開始自覺者在那幾點？我們的答案不能不說是很貧乏的。老實說，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五四運動到了最近的時期，中國民族的意識雖然一方面說是正在一步一步向自覺的程途上走，然而他一方面則不能不說這種自覺意識的發展還是很遲緩的，很茫昧的。更切實地說，我們的民族直到如今還沒有發達完備的民族意識。一個完滿的自覺的民族意識，決不是單單的政治組織或者經濟組織所能代表的，政治上和經濟上

所表現的民族祇是一種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精粕，真正民族的內在意識還要從思想文化上去找，雖然思想文化的內涵也離不了政治經濟等等。一個民族走上了自覺的路，就如一個人意識發展到了成熟時期一樣，他有了獨立的智慧去判斷一切的事理，去抉擇自己所應該走的路徑，去完成自己的獨立的思想。成熟的個人思想是有系統的，是有計畫有理性的，成熟的民族也是這樣。反之，在未成熟或者未自覺的民族中間猶如未成熟的個人一樣，一切舉措都沒有理智的判斷，也沒有系統的計畫，他的行為和思想都只是一種環境的反射。五四以前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我們不必細說，可以說全是在一種茫昧的不自覺的時代，即有自覺也是很微少的。五四以後的時代又何如？淺見的人或者以為從此民族的文化意識已完全覺醒了罷，是嗎？事實回答我們說不然。五四時代的思想運動不過是一種偶然造成的機會，在事前事後都沒有一種理智計畫和意識的自覺。新青年出版之初，誰能料到國語文學的成功？當曹汝霖住宅被毀的時候，誰能料到會影響於此後一年內的出版界呢？新青年雜誌一直到七卷一號才有了系統的主張，就那個雜誌本身說，可以說是從七卷一號以後才入於完全自覺的

意識狀態，然而方才揭起了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兩面大旗，轉眼的工夫就被陳獨秀帶入了勞農專制的另一條路上去，這算是一致的計畫和意識的主張嗎？新青年時代以後，中國的思想界忽而杜威的實驗哲學，忽而羅素的新唯實主義，忽而語絲派的懷疑思想，忽而共產派的唯物史觀，僅僅十年之間，變換了若干種不同的花樣，健全而自覺的思想是應該這樣的嗎？杜威和羅素全是舶來品，可不必說，語絲派多少可以代表中國民族對於自己文化的反省態度，這種反省大約自中日戰後的維新運動起，一直經過新青年而到語絲為止，所表現的是中國民族的一種自覺過程。但直到語絲為止，所表現的還只僅有對於過去的消極的反省，而沒有過此以上的東西。我們試問語絲派，你們摧滅了或者批評了中國舊文化之後可能拿什麼東西去代替他？語絲派並沒有給我們正式的回答。新青年時代尚有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兩個積極標準，語絲派並此也沒有。我們試問語絲派，你們是贊成英美的德謨克拉西的政治呢？還是贊成俄意的狄克推多政治呢？他們不能回答。你們是贊成全盤承受西洋文化，連軍國制度和資本制度也完全承受過來呢？還是從中有所抉擇呢？他們不能回答。你們是否澈底的

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者你們對於與自由主義極端相反的一切專制思想究竟取如何的態度？他們還是不能回答。這可以證明語絲派只有消極的反省而沒有積極的方向，他們所代表的僅僅是民族自覺的低級方面，是半自覺的民族意識狀態。再其次如共產黨的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宣傳，似乎不失為一種積極的方向，然而這是民族意識的自覺表現嗎？中國的唯物史觀徒究竟對於唯物史觀有多少的了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疑問。中國的馬克司主義研究者可有像日本那樣繁多而且深沉的嗎？我們能在中國出版界中找得出三五部以上中國人自著的研究馬克司主義或者唯物史觀的系統著作嗎？——就我的淺見所知，連一部也沒有。這樣，像唯物史觀這樣成爲口頭禪而且一部分成爲信念的中國，連一部系統的研究著作都沒有，這可見中國人所了解的是什麼程度？這樣的信仰能算是經過理智和完全自覺選擇後的信仰嗎？唯物史觀或者共產黨人所主唱的經濟命定論在中國思想界唯一的實在，根據是中國受列強經濟壓迫的事實，列強對於中國的經濟壓迫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幫助了共產黨經濟命定論的暗示。但依理論的推展，經濟侵略的事實至多只應該引起保護貿易，

關稅自主一類的國家經濟學觀念，而何以反引起毫不相干的國內的階級鬥爭的主張，這可見由經濟侵略到經濟革命只是一種模糊的聯想作用，猶如小兒認木片爲餅餌一樣，完全是民族意識未發展以前的狀態。又如近數年政治上以絕不相容的民族革命和階級革命兩個觀念聯合在一起而建設一種非驢非馬的革命觀念，更可見民衆推理力之全未發達，即自覺意識之尙未完成。我們固然知道從新青年到語絲派，從語絲派到共產主義者，都不過是少數人或者幾個人的思想，原不能以此即概括中國民族的全部思想；但個人的思想乃是民族思想的反映，一種民族在未自覺的時代，就其中優秀分子的個人意識狀態講，雖然已經成熟，然而他的思想還只能代表不成熟的民族思想。因爲個人的思想不能不以民族共同的思想爲出發點，出發點低者其成就必低，出發點高者其成就亦高，乃是自然的道理。今日中國許多成熟的個人表現出如此幼稚的不成熟理想，正是民族自覺意識未發達的表徵。從五四以來的十年，只代表一個半自覺的文化意識的時代。倘若我們希望這種半意識狀態的文化運動到今日應該告一段落，我們以前種種的錯誤和消極都可諉之於民族自覺意識未發達之

一般理由，則我們以後所應當努力的便是怎樣促進這種民族自覺意識之完全發展，怎樣用個人已經發達完備的理智來指導民族文化運動的進行，使盲目的、被動的、不自覺的前期文化運動進而變成意識的、自覺的、有計畫、有目的、有理想的後期文化運動。這就是我們今日當前的責任問題。

從五四以來經過十年時間的努力的思想運動，到了最近三四年收了他的恰如其分的效果。這種效果之不能令人滿意是人所共見的。因為效果之不能滿意於是才又起了煩悶和懷疑的狀態，我們今日的大多數青年正又重新陷入了一個這樣的時代。這種時代的空氣雖是不好，然而却不能不認為是一種進步。在四五年以前，前期思想運動正在蓬勃一時的時候，大家是沒有這種感覺的。那時候大家以為思想運動已經做得澈底了，以後應該是投身實際的運動時候了。然而幾年以來，實際運動的結果到今日完全呈露於我們的眼前，這種情形是禁不住人們的失望的。因失望而發生懷疑，因懷疑而發生反省。於是才重新回復到思想運動的老路上去。這一種反覆的過程，

所表現並不是一個人或者少數人的心理改變，乃是民族的全體心理改變。我們在最近的歷史上可以找到出相同的例，清朝末年，光緒三十年前後的時代，中國曾經過一個相當的思想運動，這種經過我們可以不必詳說，思想運動的結果是造成中華民國之出現。從中華民國一出現以後，大家以為思想的工作業已告成，此後是專心於實際建設的時代了，然而不幸跟着便有一個反動的黑暗的時代到來。從民國三年到民國五六年，我們民族的精神又重新陷入一種懷疑的、煩悶的、彷徨的時代。於是跟着新青年就出現，文字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大旗就舉起，五四運動就開始，這才拯救了一切煩悶，重新指了一條新路，已死的思想運動才算復生。五四以後的思想運動與民國以前的思想運動是顯然不同的，後者是完全不自覺的，而前者則至少也是半自覺的。從不自覺的思想運動進步到半自覺的思想運動，這其間表現的是國民的覺醒，不是個人的覺醒。現在，這個懷疑的、煩悶的、彷徨時代又到了，我們是又準備了第三期思想運動的出現麼？這可以無疑地斷定說是的。國民的意識由不自覺經過半自覺而逐漸向完全自覺的程途進行，猶如懸崖轉石一樣，不動則已，一動則不可復止。一個完全不自覺

的民族也許永遠會長此不自覺下去，以至於退化死亡，但是自覺的萌芽一動以後，希望他中途自動的停止是絕對不能設的。從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中國國民自覺的機械已經開始發動了，無論什麼大力是絕不能將他再停止的了。懷疑，煩悶，徨徨，都不過是一種新生時代的預備，我們的民族是不會長此彷徨下去的。我們從已往歷史的先例看來，我們敢說又一個思想運動的時期已經到了，新的生命已經開始了，不要彷徨，不要遲疑，我們急起直追上去！

不過所貴乎民族的自覺者，並不在奮興與失望的狀態相間而造成一種循環的試驗，我們所要求的民族自覺是進步的而不是循環的。前一期的思想運動假如有錯誤，我們後來者是不應該再踏着這種錯誤走上去的。我們要求文化的累積累進，後來的必定勝於以前的，這才是長進的民族的做法。前期思想運動的優點，我們當然保存，而且繼續發揮下去，前期思想運動的缺點，我們不也應該補足或者矯正的嗎？

怎樣補正或者矯正前期思想運動的缺點，我這裏不能詳說，等以後再談。總之，至少一個精神是需要的，就是理智的判斷的圓滿的發展。幼稚的民族不自覺或者半自

覺的狀態無他，只是由於理智的未經成熟，只是由於無知。世間多少罪惡都是產生於無知。親手用屠刀殺人的人，他們的心中也許懷抱着一個至高尚純潔的靈魂，他們也許以為這樣去做是合乎上帝的慈悲意旨或者全人類的需要，他們也許以為不這樣做便不是世界潮流。他們的靈魂不能說不純潔，造成他們做惡事的不是由於人格的卑污而是由於理智的未進步。一個高尚的人格必須有一個充分的理智去輔助他，才能做出好的事來。我們現今的第一個責任便是促進民族理智的圓滿的發展。我們倘使想到已往的幼稚的非理智的思想運動，造成許多實際的罪惡，我們許多有勇氣有希望的青年，不幸為幼稚的觀念所迷誤，而至於以身殉之，這是十二分應該悲痛的事。根本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充分的智識，湖南十四五歲的青年，個個都曉得喊世界潮流，就因為迷信了這個世界潮流，害了地方，害了別人，結果還害了自己。五六年來有意的不忠實的世界思潮介紹，在中國民族中造成一種似是而非的淺薄觀念，結果殺了無數的人。我們或者也可以說這種原始的介紹者，追隨者都是出於高潔的動機，但是其常識的不足是不能為諱的，為什麼這許多淺薄無識的理論在理智發達的國家不能

傳佈，而獨有在民智低下的國家中猖獗？這其中還能說沒有聯絡的關係嗎？忠實地介紹全部的世界潮流的真相到中國，依據充分理智的判斷使真理不為主觀成見所隱蔽，這是中國民族目前最需要的一件事。人的無知是由於無常識，民族也是這樣。倘若想引導不自覺或者半自覺的中國國民走入充分的理智的，自覺的意識狀態上去，造成一個超越一切的後期思想運動，則常識的補充是極重要的，尤其是關於世界潮流的常識。

理智的橋是從前期思想運動過渡到後期思想運動唯一的徑路，走與不走，當然還在自己。

房龍的『人類爲思想的權利而奮鬥 的故事』

著『人類的故事』的亨利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大約在

中國人腦中已有相當的印象了。人類的故事並不是一種奇書，但不失爲一種好書。拿來與愛好和平、夢想世界大同的中國人去讀，雖然有些藥不對症，但總是可以投合脾胃的。本來房龍著那部書是給歐美的小孩子們去讀的，並不是給東方人去讀的，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懂得東方人，試看他對於東方——尤其是中國——的故事叙得很簡短，可知他對於此方常識的缺乏。在歐美今日，給小孩子們讀些關於人類全體的故事，變更變更他們傳統的狹隘思想，在我想來或許是正當的，但正當於歐美者不一定就是也正當於中國，理由是中國和歐美至少還相距有二百餘年。歐美已經走過十九世紀而進入了二十世紀，中國則至多也不過走到了十八世紀。我不相信中國人會有特

別的天才，能數不經十九世紀的一階段，從十八世紀一跳就跳到了二十世紀，因此我
向來對於太戈爾，羅素之流，恭維東方和平大同的客氣話，不敢表示贊同。至少吳稚暉
先生所說「外國人拿機關槍打來，中國人應該拿機關槍打過去」。這兩句話在五
十年內還是真理。世界上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不經過「三十而立」，便會跳到了「四十
而不惑」。至少沒有受過十九世紀的政治組織下嚴格訓練的人，不配到二十世紀來
講什麼和平大同。

人類的故事雖然不一定適用於中國，但是人類的故事却已經翻譯過來了。當然，
翻譯只是忠實的介紹，取舍之權還在讀者自己，我們不必因怕噎而就廢食，我們也不
必因怕思想錯誤而就拒絕翻譯。不過忠實的介紹者應該平均的介紹各方面的書，翻
譯是不應該有成見的。如此，我就勸中國人還應當繼續譯他的幾本別的书——聽說
某書局已將他的古代的人譯出，但我尙未見。

在一九二六年，房龍又著了一本書，名字叫做人類之解放（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副題就叫做人類爲思想的權利而奮鬥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s

Struggle for the right to think) 在我想來，這部書似乎比較人類的故事還有益於中國人些，但不知有人動手去翻譯沒有？

房龍在這部人類的解放裏面，他告訴我們幾千年來人類爲思想的權利而奮鬥，所爭的目標就是「容忍」(Tolerance) 兩個字。文明人與野蠻人分別就在對於異己的思想乃至言動能徵容忍與否。現代的所謂文明人雖然在某一部分上仍然不免有不容忍 (Intolerance) 的事件發生，但就大體而論，容忍已經擴大多了。我們可以安坐而批評時政的得失；我們可以在社會上，宗教上創立任何奇特的學說；我們可以出版任何書籍；除了實際行動以外，我們可以不受任何權力的干涉。即使有人如美國某州的宗教家，要出來涉干他人宣傳人猿同祖的學說，然也不過訴之法庭而已，無論勝訴敗訴總之與頭顱無關。至少達爾文是不會受過火刑，而馬克斯也不聽見有被釘十字架的危險。

不過以上所指都是就西方民族而言，東方人似乎就不在此例。

中國的民族雖說相傳是以「禮讓爲國」的；雖說是個氣度最寬宏的民族，雖然

孔二先生在二千多年前就講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的話；雖然羅素來到中國，大稱贊北京的自由空氣比倫敦多；但是，我們始終沒有學到「容忍」，我們的民族似乎還根本不懂得容忍的需要。

早先年的文字獄思想獄的事情，「遠哉遙遙」，無從說起了。即以近百年來的事變而論，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之後，李將軍 (General Lee) 將敗軍的指揮劍獻與了格蘭德 (Grant) 將軍以後，便不聽得有下文，似乎到現在這位敗軍之將還與許多戰勝方面的主帥同崇為國家的名譽勇士；擾亂了全歐的拿破崙到頭來也不過流放荒島，安坐以老，死後的遺櫬居然在布爾奔王朝的統治之下迎接回來；然而在中國，李秀成便終久不得不判決死刑，洪秀全在徼倖早死以後，還要受挖屍的慘毒。兩兩比較，誰是懂禮讓的？誰是文明開化的民族？就不難判斷了。

據房龍的意見，世界上不懂得容忍他人意見的人，大約有三種的不同：一種是懶惰的不容忍 (the intolerance of laziness)，一種是無知的 intolerance (the intolerance of ignorance)，另一種則是自私自利的 intolerance (the intolerance of selfinterest)。

我不懂得中國人的不容忍是屬於那一種的，不過據我想來大多數的不容忍還是出於無知。

鄉下人不知道修鐵路是與他們有利的事，因爲風水的迷信還未打破；清朝的太后大臣們不懂得變法立憲是與他們王朝有利的，因爲他們根本不明瞭政治的意義。一切的錯誤罪惡，都是智識的問題。

不過事實常是互相倚待的，因爲「無知」所以才「不容忍」的，也就常常因爲「不容忍」而才更「無知」起來。

要想使人類「有知」，還不得不打破這種「不容忍」的空氣。

人類幾千年來爲思想的權利而奮鬥的目的，就是爲爭「容忍」二字。

對於異己的思想，強者則以干涉，弱者則以諷刺，在思想界上造成一種刻薄殘忍的空氣，因而影響到實際的政治和社會，將亡的民族大抵如此，注定了被屠殺的民族大抵如此。

縱使有人要仿照孔二先生的口調，告訴一切的人說：「有一言而可以全中國行

之者，其「容忍」乎，但是誰來聽呢？

這就是「無知的不容忍」的最好的例。

——長夜第二期——

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後

近來有些人大喊着說：阿Q的時代應該死去了，不錯，「死去了的阿Q時代」，我們也相當的對這句話表示同意，但是阿Q的時代死去以後，代起者應該是誰的時代呢？

假如死了一個阿Q時代，而跟着就來了一大批的「留聲機器」當陽的時代，則我們寧可以還是歡迎阿Q的時代多經幾天的好，因為阿Q的時代精神雖然是消極的，懷疑的，不澈底的，但是還有一點半點的人氣。若是將這僅存的人氣也都「踢」掉，結果只剩一批行尸走肉的留聲機器在那裏替背後提線的人講話，則世界將成爲純死的世界，生活將成爲刻板的生活，靜的文明代替了動的文明，一切將要返於中古宗教當權的時代。阿Q派代表的是十八世紀啓蒙時代的幼稚精神，而留聲機器派所代表的却祇是十一二世紀黑暗時代的原人精神；我們不滿意於十八世紀應該往十九

世紀二十世紀走，我們不能開倒車地返回中古黑暗的宗教專制時代去。我們是活的人，讓「高亭」「百代」去創作他們的留聲機，我們活的人應該說我們活人的話。

而且，「死去了的阿Q時代」這句話的用字也下得不大適當，我們的意思，阿Q的時代不應該是死去，而應該是站在這個基礎上更建立起較新的生命來。

不錯，阿Q正傳及一切其他代表前期文化運動的時代精神的作品，作者魯迅及其追隨者，都是思想已經落後的人，魯迅自身是一個足踏在新舊過度線上的老新黨，他一方面有新的時代的破壞的、批評的、追求理想的精神，一方面又不能斷然捨去那舊科舉時代所遺傳下的名士風，尤其是紹興鄉土派的尖酸刻薄的刀筆風味，這是他終身的大缺點。但是我們應該原諒，魯迅已經是個四五十歲的老人，與他同時代的老人，甚至時代稍後的中年人，都已成爲全然落伍的遺老遺少，而魯迅還能勉強掙扎起來，向着前進的路上走去。他雖不是個光明的創造者，他却不失爲一個光明的追求者。他彷徨、遲疑，在過去黑暗的路上等待了四五十年，他渴望着光明的到來，但他不知道接近光明應該往那一條路走。他所經驗的都是些黑暗、彷徨、痛苦。這種長期的黑暗

時代將他的活潑潑的創造能力萎縮了，他結果只能做一個寫實的文人，而不能做一個理想的文人。但是在過去的前期文化運動之中，正需要這麼一個偉大的寫實作家，他將時代的黑暗、時代的罪惡，毫不客氣地用筆尖將他暴露在我们的眼前，使我們感覺到大家正在一個茫茫的長夜裏，這是他對於時代，對於中國，對於我們唯一的貢獻。但是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已不是僅僅需要那消極的、敘述的、訴出黑暗的痛苦的時代了，我們應該是要怎樣解除這些痛苦；怎樣創造中華民族的新生命？怎樣找尋理想的新路？這些，魯迅和他的追隨者都不能給我們，所以他們已經過去。

然而「過去」並不就是「死去」。阿Q的時代雖已過去，阿Q時代中所留給我們的精神上的遺產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這種消極的時代需要還未完全過去，中國還有做批評、破壞的工作的需要，因此魯迅及其追隨者在此後十年之中自然應該還有他相當的位置。不過把阿Q的時代精神當作唯一的精神，將魯迅單在紙糊的高冠底下作成唯一的偶像，阻礙了前進的路線，摧折了新時代發生的動機，將中國民族永遠留在遲疑、徘徊、消極、破壞的老新黨思想的路上去，這却是不應該的。因此我們不

能不高呼着說，應該是越過了阿Q時代的時候了！

但是，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後又該怎樣呢？

這話不必我們回答，且讓現實來自己回答罷。

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描寫的不是一個單純的流浪者阿Q，而却是中國民族所有種種惡根性的縮影，這是一般所知的，但是我們所要追問的，阿Q正傳中的阿Q所代表的種種缺德是否普遍地可以肯定於全中國的農民社會乃至全部民族身上呢？除了這些缺點以外，阿Q及其同伴是否還有可以值得注意的優點呢？關於第一問，我們在同作者的他篇小說如故鄉中所描寫的同等人物如閨士，便不曾發見這種缺點。關於第二問，更是我們這裏要細說的，讓我們說下去。

我覺得我們這裏所有討論的阿Q的精神是否可以成立的問題，實在就是對於中國民族性的全部觀察的問題。假如阿Q的精神充分代表了中國民族，則我們只有肯定中國民族已經衰老或者將近死亡的事實，我們沒有別的方法可想，只有悲觀，悲觀到底。一切的活動，一切的向上，無論是民族的，或者階級的，或者其他等等，都是

假的，魯迅雖然沒有明明告我們以這種感想，但他的作品却明明只能引起這種感想，這是無庸爲諱的。

但我們的意見却不如此。

我們根本不承認中國民族或者文化是已經衰老的，這並不是說中國的舊文化還可以保存，還有光華燦爛的價值，只是說中國民族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文化，還沒有成熟的思想，中國民族一直到現在還是幼稚的，素樸的，不開化的，半原人狀態。

原人的缺點是蒙昧而不是機巧，然而阿Q正傳中所表現的精神却正是機巧。

這種機巧的性格當然不是絕對在中國民族中找不出來的，不過總不能說是普遍地代表了中國的民族性。因爲我們平常的觀察往往誤於兩個錯點，第一個是職業性的錯點，第二個是地域性的錯點。就職業的觀點論，中國的士大夫社會這種機巧的性格是非常發達的，這是由於幾千年專制政體所養成的，但大多數的平民却不一定如此；就地域的觀點論，則與大都會接近的地方，文化較開的地方，民族性多趨於機巧，

而文化落後的內地則不然，阿Q正傳所描寫的或者是某種職業或某種地域的特殊現象，而不一定是普遍的現象。而且即在士大夫階級中，我們一方面固然看到投機派所做的種種機巧的醜態，一方面不是還看見有許多青年或者中老年，肯爲了自己的理想——即使是很愚昧的理想——去犧牲幸福，犧牲名譽，乃至犧牲性命，做傻子的事業嗎？即在文化久開的錢塘江畔，不是還看到有魯迅一流的老呆子肯拚命地不怕得罪人，寫出社會的醜惡，罵倒機巧的阿Q風嗎？因此，我們雖然應該承認在某一份上阿Q正傳的描寫是絕對真實的，但却不能從此引出一種澈底悲觀的感想，說中國民族整個都是如此。

老實說，中國今日的作家不幸都是出於一個單純的文人社會中的，對於民衆並沒有接近，根本不了解民衆的真相。魯迅以爲全中國人都像他一樣的徘徊於新舊之間，因而以爲中國民族性是消極；郁達夫以爲全中國人都像他一樣有充裕的生活，因而以爲人生的需求只是性慾，此外一切留聲機器派更是天天在那裏喊些「無產階級」文學的口號，結果他們創出來的什麼「奧伏赫變」之類，連「有產階級」也要

頭痛。不了解民衆的作家，不能寫出真正代表國民大衆的文學。

就中還是魯迅的經驗多些，比較地和現實社會更接近些，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更富於真實性。可惜所謂真實者，祇是部分的真實，而却博得了表現普遍的中國國民性的美稱。因此我們就不得不將他來重新估價。

不過無論如何估價，他總是在中國今日唯一難得的真實描寫者，我們應該擁護這個唯一的偉大的寫實文學的作家，我們不能讓一般淺薄無聊的小嘍囉們將他打倒——雖然他們也不配打倒他。

我們唯一的要求便是將這部分真實的表現，擴大而為普遍的真實表現；將僅僅代表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紹興的鄉土風味的文學，擴大而為表現全中國國民性的文學；將消極的懷疑的中立態度，改變而為積極的勇猛的前進態度；將冷酷的批評，變成了熱血的呼喊，使今後的全國國民在軍閥、官僚、土匪、流氓、共產黨、帝國主義之下所受的重重壓迫，種種苦痛，盡量地從今後文學家的筆下宜洩出來；一方面將前路的光明告訴我們，鼓動着我們往前進。這是繼魯迅而起的文學家所應該擔當的責任，這是

越過了阿Q時代以後的新生命。這個精神與魯迅的精神不是相違背的，不過比他更擴大一步而已。我們之所以能設擴大，就因為他已經打了狹小基礎在前面。我們應該站在這狹小的基礎，感謝過去的努力，而挾着更擴大的精神往前走。

——長夜第三期——

荒原的夢

每個人都有他的夢，有的夢在溫暖的天鵝絨褥上，有的夢在愛人的懷裏，我呢，我的夢只寄在西北杳杳無邊的荒原上。

在某一種意義上，我也可以算是西北的人，雖然實際上我連西北一痕土地也沒有踏過。在兒時曾經到過「中州」，那時節大約還是太平的時候罷，白麪賣二十七文制錢一斤。在「中州」，我們山西的會館常是與陝西甘肅聯合在一處設立的，裏面幾乎完全是供着「關老爺」當鎮館之神，似乎在名義上山陝甘總是一個區域，而「關老爺」便是這三省唯一的代表人物。至少在河南人看起來，我也可算是西北的人了。前年當某軍在河南聲勢赫赫的時候，城外幾十里的地方捉住單身的陝西人便有殺頭的危險，而最不幸的，山西人並沒有在河南討到多少便宜，但是殺頭的危險却全然與陝西人分擔着，則在其他地方的人看起來，山陝是何等分不開的命運了。最遠的如

廣東，似乎以前也會聽過有自稱山陝軍總司令者拍賣山陝會館的故事，會館也是「山陝」，聯軍也是「山陝」，「山陝」是何等分不開的命運啊！然而「山陝」却至今分立着。

最奇怪的是，河南人殺陝西人，陝西人殺河南人，胡某人、岳某人幾次從陝西帶兵衝到河南，劉某人、柴某人又幾次從河南攻到陝西，大家都好像別人的土地更值錢的一樣。「豫陝」是這樣解不開的冤仇；然而我們却似乎聽說有所謂「西北」也者，從甘肅一直統屬到河南，於是乎某一種的政治分會便劃分成立了；這還不奇怪，最奇怪的是從前帶兵圍西安城八個月的劉什麼，現在竟與守城的「某某二虎」同隸在一個軍的旗幟之下；天下的冤仇是這樣的解開了，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現在，自稱中州的河南人，似乎也不能不自認是西北的人了，我的西北荒原的夢從此又擴大了一步。

我的夢常是這樣向西北渺渺的荒原上伸展着。

西北實在不是荒原，我們幾千年來祖宗的墳墓層層地擺在那裏，在那土厚水深

的高陵上，我們還可以發現一痕一痕先民耕種的遺跡，從仰韶村石器時代的人迹，一直數到圍城八月中的慘狀，那一件不是我們應當深刻不忘的呢？西北是這樣熱鬧的所在，他並不是荒涼的曠野，而我寧願以荒原視之，西北現在已是荒原了。

我們既然有了歷史，有了文化，這是我們肩上已經背了一副重的擔子，我們誠然是放不下的，而且也沒有一定要放下的必要；但是背着擔子只曉得回頭看的人，我曉得他是沒有希望了，因為希望常常是要往前看才找得到的。

即如土厚水深的西北，在某一種意義上何嘗不是最文明最燦爛的區域？然而到了今日，文明那裏去了？燦爛那裏去了？唐虞三代的黃金時代那裏去了？周秦的文教那裏去了？漢唐的武功那裏去了？慢說歷史上這些文化究竟是怎樣的情形，我們還難以知道，即使知道了，又與我們現代人何補？我們還不是只有站在那些纍纍荒塚之上灑一掬懷古之淚嗎？

最可怕的是，我們的懷古之淚還沒有灑完，圍城的兵已經殺到了，於是我們的志士仁人也只有這樣被拉夫的人拉去完成。

志士仁人這樣一天一天地減少，西北便一天一天地恢復了荒原的面目，剩下來的都是原人。

在二十世紀的世界裏，原人總是站不住的；但原人的精神總比老人的精神好些。文化的發展是直線的呢？還是循環的呢？我不是文化學家，不敢斷定這個問題；不過據我的常識判斷起來，文化似乎總還是循環的。試看，埃及、印度之流到現在都已老了，巴比崙和古墨西哥則竟已滅亡，文化老的民族是何等的危險啊！中華民族果然有很久的文化嗎？中華民族果然有很長的歷史嗎？如果有，也應該到了老衰的時候罷。

所幸者，文化是循環，一直還往前循環着。從文明到老衰乃至復歸於原人，是一個循環；從原人漸漸滋生了新的文化，又長成到光華燦爛的時代，又何嘗不是一個新的循環？中國是一塊大土地，中國人是一個複雜的民族，所以有些地方儘管正在光華燦爛，有些地方方在新生，有些地方却業已老衰，有些地方則竟已復歸於原人時代。不客氣地說，西北地方便是這屬於第四類的一例。

西北已經超過了老人的時代了，他已經有原人的血在血管裏湧着，慢慢會漲

成無限度的高潮。

站在賀蘭山的峰巔往下看，誰不驚歎這一塊綿亘四五省區的茫茫白地呢？誰不驚歎蜿蜒幾千里的夕照下金色的黃河呢？誰不驚歎幾千年來歷史上開拓的偉績呢？歷史給我們的貢獻就只有這一點，我們並不向歷史去討尋剩下的遺蹟，歷史所能够告訴我們的，就是我們的祖宗能殼在白地上建設起一路的亭臺，我們現在應該有更多的亭臺建設起來。

我們要勝過古來的人，不要讓古人來笑我們。

說到這裏，我又聯想到未來中國建都的問題。我一向是主張中國的都城應該建設在武漢，雖然我始終沒有到武漢去走過一趟。北京實在太腐舊了，大風沙的底下，充滿了烏烟瘴氣的官僚文明，這種文明是只有用綠氣砲才可毀得掉的。至於南京呢？不用說別的，只就從上海交通太便利的這一點上，已經覺得洋場買辦之氣不可嚮邇了。南北二京既然都似乎不殼國都的資格，於是我的國都的夢便集中到武漢。但是到朋友T君回來以後，他的主張戰勝了我的，他以爲一切國都的條件是應當遠離商業中

心的，遠離所謂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的，遠離着腐舊的惡勢力的，武漢并不能適合這種條件。小的說，人情是那樣險詐，甚至於一個挑夫也比內地的響馬還凶惡；大的說，帝國主義的砲輪是依舊可以自由開到武昌城下，如同可以自由開到南京城下一樣。我們理想的國都不是這樣的。我們要找土耳其安哥拉一樣的一個國都，我們要找俄羅斯莫斯科一樣的一個國都。T君的主張，應該向西北渺渺的荒原上去找。

我從前憂慮西北的文化太古，太衰老了，恐怕不會有作中華民族活動中心的資格了；現在我感覺到這個意見是錯了的。正因為文化是太古，太老，老到已復反於原人的時代了，充滿了精力的原人，他有他前途無限的希望，比正在文明中的人還要可樂。況且實際上西北從漢唐以後，已經不斷的攪入新民族的血；而所謂舊文化者，又只限在少數士大夫的羣中，多數平民還在猿獠未開化的時代呢？

我們的國都不應該建設在這一個茫茫的新地上嗎？我們的新民的新生命，不當寄託在這一塊新地的中間嗎？

T君的主張，終於戰勝了我。

我睜開眼從夢中醒來時，看見東南的海上布滿了所謂列強的旗子，吳淞口和沽口都已塞滿了兵船，我們民族半邊的生命已經斷絕了。向海上嗎？海上沒有我們立足之地了，向陸地去吧！向西北去吧！開我們祖宗幾千年未開盡的荒去吧！中華民族的未來生命，就寄託在這西北大陸政策之上了。

我們可憐憫的中國人，一聽說什麼政策便以為有帝國主義的嫌疑，然而人生而有吃飯的權利，因吃飯而有吃飯政策，似乎論理尚未大謬。我們為什麼不去向西北去找飯吃呢？一個理想的代表國民的政府，不是應該負有替國民制定找飯政策的責任嗎？假使大家飯碗增多，又何必在國內鬧什麼搶飯吃的赤化黑化呢？

我的夢是這樣做着，一直做到西北白地上建設起千萬的樓臺以後。然而我所怕的，是在自己尙無人去動手建築樓臺以前，別的人却先來替我們動手做了。於是別人便可以住在高樓大廈裏面每天吃白麪，吃大米，我們的民族呢，沒有更多的大米與白麪吃，只好轉回頭來吃人。人與人相吃，由口號變而為事實。於是打倒土豪劣紳的，與被土豪劣紳所打倒的，大家面紅耳熱，彼此爭個不休，基本上只為了一碗飯。然而眼前白

地上有許多飯碗擺着，却沒有人去拾。

『什麼東西！土豪劣紳的走狗！反革命殺殺殺！』我終於被這種聲音驚醒了。醒來時，似乎已經聽得大家敲飯碗的叮噹的聲音，地下的破碗片也似乎堆了幾堆，然而西方仍是茫茫然，天似乎永遠不會晴，人似乎也永遠不會擡起頭來往更遠的地方看一下。

叮噹！叮噹！破碗片的聲音，永遠這樣敲着，直敲到白地上已建築起他人的樓臺以後。

——長夜第三期——

民族精力與文化創造

大杰：

接來信知長風就要出版，並且得知上海出版界之盛況，非常欣悅。

去年一年中在上海居留的結果，使我感到中國的文化運動又要踏入一個新時期，曾在長夜半月刊上略略申述此旨。大抵政治運動失敗以後，常有令文化運動代起的可能。去年一年中在上海並看不見什麼文化運動，所見者只有青年的煩悶，和少數名流要人指示的所謂「青年之路」或者「青年呼聲」之類。卽在今年，我雖然不曾眼見，大要也不過書局業比去年略略增加而已，也還算不上什麼文化運動不文化運動。不過我總覺得密雲是下雨的先徵，倘若青年的煩悶可以算做密雲，則今年這些書局業的發展和出版數量的增加或者可以作爲是雪前的微霰罷？

我們時常覺得，凡在創造力未曾萎縮的民族，他的活動是時時刻刻不會停止的，

只有方向可以變更而已。中國人的活動自有歷史以來已經五千年了，近千年來雖漸漸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傾向，然而活動力始終沒有停止，是誰也看得見的。這九十年來，受外力壓迫的刺激，才漸漸擡起頭來接受西方民治和科學精神的洗禮，於是有所謂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相間而起。洪楊的政治革命失敗以後就有曾國藩派遣留學生出國的計畫，和江南製造局譯書的事業。於是有同光之際的文化運動，於是甲午至戊戌之際的政治運動，於是有辛丑以後東洋留學生的文化運動，於是有晚清的政治革命運動。辛亥的革命成功，緊跟着就是革命的失敗。民國五六年時代，人心銷沉已至極點，但是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的醞釀就在此時。五四以後文化運動漲到最高潮，才產出近幾年來的政治運動。我們從眼所看不見的一直數到眼所看見的，這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相間而作，竟似乎成了一個公例。大概人民對現狀的不滿常是先和平的形式發表出來，這種形式便是文化運動的形式；到了文化運動已經相當的成熟，人民的力量漸漸儲蓄厚了，才有以實力與現狀反抗的可能，這時政治運動便即應運而起。政治運動成功以後，倘若現狀仍然不滿於人意，則不免有第二個煩悶的時期醞釀出

第二期的文化運動。以上所得到的如果真是一種公例，則我們不可以說今日正是又一期文化運動應該醞釀的機會嗎？

但是我們祇知道今日應該是又一期文化運動的醞釀的時機，却不知道這一期的文化運動應該是什麼形態？人類是進步的，總不會時時照抄老舊的文章。況且今期的現狀如此，正是前期文化運動所結之果；既然對於前期所生之果不滿，自然救治的方法也決不是照抄老卷所能了事的了，大杰：這個問題不是我們今日一切大眾所應當共同深切留意的嗎？

我在『前期文化運動與後期文化運動』——長夜第二期——中曾略略述到——自己對於這一個問題的觀察意見，我覺得這九十年來中國的文化運動，祇是一種民族意識的解放運動。民族的意識在大一統的時代久已到銷沉、禁抑、以至澌滅的境地，一旦經過外患的壓迫，不由得不向覺醒的路上走。此刻壓迫我們的外患，不比那些五胡、遼、金之類的外患僅僅是武力的蹂躪而已，他們是挾着一種高尙的文化以俱來的。他們的文化猶如他們的武力一樣，遠超越於我們目前這樣貧弱的民族，因此他就

給中國民族以一種當前最大的難題。就是我們對這種外來的高尚文化應當取個什麼態度？這個問題在一千五百年前曾經同樣地發生過，這就是印度文化輸入中國的時代。不過那時代的問題和這時代的問題不同。印度文化的輸入是和平的輸入，他們並沒有超越的武力作爲後盾，因此中國人接收他們的文化也祇是一種自動的選擇，與主人的接待賓客一樣，歡喜的就留下，不歡喜的就撇開，並不用什麼作難。今日則不然。武力之後有文化，文化之前有武力，不接收則勢不可能，接收則情有不甘。蓋昔日的接收印度文化祇是一種精神的交換，今日的接收西洋文化則不免精神的屈服乃至實際的屈服。然而欲不接收則又是萬萬不可能的。這才是現在中國人當前的難題。就是怎樣的接收了外來的高尚文化的優點而又不損及國民的自尊精神？九十年來的是中國智識階級，就是代表了全中國民衆而首先努力以求解決此問題的。欲解決這個問題的準備。第一不可不先了解外來文化的性質，第二不可不決定自身的態度和方法。九十年來的中國民族，一步一步向這個路上去走。最初的努力自然是很茫昧的，因爲當時既不了解外來文化的真正性質，又不是有如何的自覺心感覺到接收

的必要。到了外患一步一步緊迫到目前，中國民族——最初是中國的智識界，才從睡夢朦朧中手忙足亂地驚醒過來。對於外來文化認識的進步，對於自身態度決定感覺的急迫，這都是中國民族逐漸覺醒的表示；而對於外來文化認識之不徹底，自身態度決定之冒昧無理性，也是中國民族還未完全覺醒的徵候。即以近八年來的新文化運動而論，雖然對於西方文化的認識已大有進步，然而究竟離徹底了解的程度尚遠，因此造成了一種一知半解的時髦文化觀。拋棄了真正科學的陣壘而讓掛着科學招牌的偽貨得以暢行，結果是戕害了無數天真勇敢的青年，而時事也就越發壞亂不堪。我們看了這個，便可知所謂文化運動者，並不祇是幾個書生酒醉飯飽之後迂闊無用的玄談，而確是關係於民族存亡，國家治亂，社會榮枯的大關鍵，而不可以輕心掉之的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略略陳述和一般人意見不同的地方。在今日一般時論中，對於上段所述的二個問題，大致都已了解而感到他的需要，和我們的意見沒有什麼出入。但我們的意見，覺得中國文化運動的當前問題還不盡止於此。我們當知今日中國文化問題雖是由於外來文化的接觸而起，但歷來文化運動的本質却並不盡由於

外來文化的影響。外來文化不過是偶然的一種機緣，大部分的民族文化運動，並不必待必有外來文化的催迫而始能發達。當歐洲文藝復興的當兒，四圍並沒有高過於當時歐洲文化的民族加以催迫，然而也能鼓動起那樣大的潮流來。可見民族文化運動的真價值還不一定在對外，即使一無外來的影響也禁抑不住長進民族向上的文化運動。又如就中國的文化史跡而言，周秦諸子百家爭鳴，並不因為有外來文化的幫助固不必說；就是印度文化在未輸入以前，也已有魏晉諸賢的疑古解放運動，佛學的輸入適當其會，故能以加速度發展起來；假使當時沒有印度佛學的輸入，晉以後思想家也必會建設起一種新思想系統來；即如明末清初諸學派便是不待外力自行建設起來的。可見文化運動並不待於外力，主要的原因還是自內。自內的解釋也有兩種。有人說：文化運動都是由於「救時之敵」，即是說，當社會越擾亂，環境越不堪的時候，才越可以激發動人的思想，使之起來為新的理想作戰。這個解釋固然有一部分理由，但似乎還不足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因為救時之敵的文化運動不過是消極的，歷史上的文化運動並不止是消極的，還有積極的。譬如清代學術的起源雖在明末，而發揮光大却

在乾嘉之際，這與救時之敝並無關係。換言之，即其文化運動的動機並不由於客觀環境的壓迫，必另有其真正的主要原因。這個原因是什麼呢？我說就是民族的精力問題。凡是富有精力的民族，無論處於任何的環境，必想法以求進取及發展，他的發展有的為政治的，有的為經濟的，有的為文化的。凡是一個精力滿滿的民族，這三方面的發展必然都很積極，而文化的發展尤為後出最高尚的發展。根本祇是一個民族的內在精力的驅迫，其他客觀原因都是後起的，偶然的。我說民族的精力並不是一種抽象的玄想，並不是什麼先天固定造成的，民族固然各有各有不同的血族氣味，但這種血族氣味在近世民族中，很少有絕對單純的；民族精力的養成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民族本身自造的社會環境，如同安定的政治生活，豐裕的經濟生活，都能使民族的精力逐漸儲蓄深厚。在精力儲蓄深厚的民族中產生出偉大的思想，再以此偉大的思想陶鑄民族，使更發展成偉大的文化系統。這種個人與民族的互想薰習，是社會文化造成的普遍現象。一個民族在平日既因政治、經濟、以及偉大天才之薰陶培植，儲蓄成深厚的精力；在平時即無機會，已經禁遏不住他的自求發展；如同漢唐太平時代的文化，都是民族

精力自求發展的表示，到了亂離之世，環境壓迫愈甚，給予的刺激性愈大，故民族精力的表現愈加明顯，這時候民族精力的表現便多用到消極反抗的方面上去，雖與太平時代積極的發展不同，但終不失為民族精力的一種表現。無論積極也罷，消極也罷，總之充滿精力的民族，是不肯一時一刻不動的。最怕的是精力萎縮的民族，遇事苟且偷安，以敷衍為能，以進取為戒，像這種情形最是無可救藥。中國在漢唐以前，絕無此種現象；不幸自宋以後，這種現象一天顯似一天，民族的精力日就枯竭，文化及思想上自然沒有什麼成就可言。這種情形，就是民族衰亡的預兆，中國當前的問題莫大於此。

我們現在不敢說中國民族的精力已經衰微到若何程度，因為我們還時時看到青年中國的精神不斷地在那裏發露出來，這是我們所可以稍稍引為欣慰的。但就大部分說，就與古代中國人的文化精神以及現代各國國民的比較上說，現代的中國國民，至少其精力大部分還在埋沒或者沉醉之中；這個沉醉的國民精力若不將他喚醒，是斷難望他爭存於大地之上的。因此我以為中國目前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問題，還不是怎樣對付西方文化問題，乃是怎樣喚醒自身的國民精力的問題。國民獨立自主的

精力若不恢復，無論外來文化如何，終是空談。一味抵抗外來文化固然是盲目無知，即極端歡迎外來文化也終屬不得要領。我以為今後的文化運動當注意到這一點，須使一切世界思潮以及古代文化皆有為我現代中國人註脚的氣魄。根本認清了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我們要為現代的中國人而生活。一切思潮文化都是供我們用以發展的。現代的中國人的生活而用的。我們要堂堂地做一個人，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做古人的奴隸，也不做外國人的奴隸。我們不做線裝書的奴隸，也不做蟹行文字的奴隸。我們不做孔丘孟軻的奴隸，也不做馬克斯牛克斯的奴隸。我們也可以歌誦五千年光輝燦爛的古中國文明，我們也可承認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化是有極端採用的價值。但我們的期望不能僅止於此。我們要在古中國文明之上重新建設起一個新中國的文明來；我們要在現代世界文化的基礎之上用中國國民的精力給他更創出一個新面目。我們所怕的是國民的膽太小了，勇氣太缺乏了，不但沒有這樣的精力，抑且連這樣的空想都不敢想一下，那就未免太不長進，不堪救藥。現在我們唯一的責任，就是要重喚起國民已失的勇氣，振作起國民將衰的靈魂，拿大無畏的精神灌輸到全中國民

衆的身上去，從此再不做任何人的奴隸，還我堂堂地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

九十年來的中國文化運動都是被動的，不自覺的，即五四運動時代雖不算被動的，也還祇能算是半自覺的，今後的文化運動倘若想超過以前的記錄，想使他在國民生活上確然發生一些影響，就不能不從完全自覺的計畫着手。喚醒沉睡的人第一着是要他恢復了他堂堂的人格，這是一切事業的最根本出發點。中國國民的總人格已爲幾千年的專制壓迫所沉埋了，我們應當去掘開這幾千年的墳墓，將木乃伊拖出在陽光之下，重新給他一種新的生力。什麼時候中國國民完全覺醒過來，覺悟他們也是現代中國一個堂堂地的人的時候，我們的文化運動才算有了相當的成功。這就是我對於今後文化運動的一點意見。以後我將系統地再寫出來。現在不能長談了。即祝
撰安！

蠻人之出現

歷史上常常有時代末的病象發現，當這個時代，人們都厭倦了一切的當前所有，甚至連企求所有的心也銷沈了；過去是徒留希冀，未來是每況愈下，當前是一無所有，有的人只得姑且陶醉於不澈底的夢幻的空想聊以自娛；有的人則縱情於享樂事業；這些還都是有心人所爲，至於無心的呢？只好更拚命的去作惡作孽了；——這個就是所謂時代末的病。

這種病是人類中最危險的病：大則有亡種滅國之痛，小則至少也使民族精力萎縮若干年，雖有哲人，無可爲力。

這個時代若是民族的命中注定沒有救星的，則只有順自然的命運逐漸萎縮銷沈下去以至於死亡絕滅而後已，埃及、巴比倫、希臘是也；否則救星自然會出現，以不可思議的神力將民族從死亡之淵中拯救出來。

這個將出現的救星不是別人；不是名貴的哲學家，不是幽默的文學家，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是新聞記者，不是黨國名流，只是一種蠻人，向來人所不注意的蠻人。

偉大的蠻人，他的出現，是民族得救的惟一福音。

蠻人並不是什麼超羣拔倫的人物；他沒有常人所具的智識，沒有宣傳，沒有交際的本領；一切人所能的他未必能。一切人所有的他未必有，然而他有他的特長，他有常人所不能有的東西，在世紀末的時候，常人都缺少幾件最重要的品性，獨有蠻人有之；因此蠻人能戰服了當時的世界。

常人之所短，蠻人之所長，在些什麼地方呢？

第一，蠻人是當時惟一具有實際頭腦的人。世紀末的常人，大抵具有一種狂幻的神經病，而且大抵屬於誇大狂之類爲多；大軍閥想做皇帝，小軍閥想做大軍閥，學生想做政客，妓女想做闊太太；……總之是不安本分者居多。他們明知沒有能力來做到他們的目的，却又始終不肯放棄他們的空想。他們只想以這種空想爲慰情勝無之具。他們始終生存於空想的世界，越是看得像十分固執着實際的人，越是空想最深的人。蠻

人則不然，他們的長處在深知他們的分際，他們是當時惟一能體辨別自己所處地位的人，當他們手中有一個饅首時，他們的問題是怎樣趕快將這個饅首設法消化下去，決不再去空想第二個饅首的權利；但如果實際的情形有得到第二個饅首的可能時，他們也決不放過一絲一毫的機會，立刻伸手將應得的權利拿來。他們並不排斥空想，但他們對於空想和實際的分別是很嚴的；他們決不將空想當做實際，也決不讓實際變做空想。因此在美妙的文詞上，蠻人自然遠遜於常人，但實際却戰勝了。

第二，蠻人是當時惟一具有為他心的人。世紀末的常人大抵是利己主義者，沈溺于極端利己主義之中。他們的世界極狹小，他們甚至於不認得整個的自己，只認得一剎那間的自己，他們寧可為剎那間的自己犧牲了此外的一切。他們實在是至愚極蠢的人，然而總是自命為至聰極明者。他們這種心理是無可挽回的。這時候能體不受這種利己的時代思潮所支配的，只有蠻人。蠻人也並不排斥利己，他們為自己戰鬥的心或者比常人還遠勝百千分；因為常人祇是夢想着利己，却不實際向前戰鬥。然而蠻人有時對於人己的界限却是不甚分得清楚的。他們並不固執着狹義的小我，他們有時

也爲他人作戰，爲他人能引起同情心，爲他人肯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尤其是爲一種公共的目標。他們有爲他人的心，有爲羣的心，他們具有一種較有廣大意思的我。他們有時爲某種衝動而殘忍地殺了一個人，有時即刻就爲某人或某事而犧牲了自己。他們的行爲是極自然的。他們並不想爲着任何人的利益，因此他們是極易被人愚弄；但實際上能設運用他們的必是與他們具有同一樣心情的人，沒有一個常人能設了解他們而且如意地利用了他們。在生物進化的原則上，蠻人的行爲確是較常人適宜於生存，因此他們的戰勝乃是當然的。

第三，蠻人乃是當時惟一具有樂觀和希望心理的人。世紀末的人大抵沉溺於一種不能掙扎的悲觀的心理之中，他們厭倦了一切，因爲他們都已享受慣了。他們在理智上看得一切都不足尊重，而在下意識上却仍然覺得件件都可留戀，可留戀的又實際如逝水一般將要去而不可復回了。這種理智與感情的衝突，使常人徘徊於一種遲疑絕望之境，最是引起悲觀厭世的根源。因此他們的哲學是懷疑派的哲學，他們的文學也只有呻吟諷刺派的文學。這都是世紀末的表現。蠻人則不然，他們是新踏入世界

的孺子，他們對於一切都沒有享受過，他們懷有欣羨、願欲和追求，在這種心理上建築起他們一切的活動。他們有進取，有歡喜，有悲哀。常人則不但沒有歡喜，也沒有真實的悲哀。常人祇有悵惘，而蠻人祇有悲哀；常人祇有嘴角的嘆息，而蠻人祇有淚與笑。這是常人與蠻人最大的區分點。悵惘斷送了常人，而淚與笑則掀動了蠻人的真實生活。

總之，蠻人與常人所分別者祇在一個「真」與「假」上；蠻人是世紀末的惟一的真人，祇有他們住在真實的世界，他們在真實的世界得到勝利，乃是當然的。

我們夢想在遠古荒唐的世界，一羣蠻人從搖籃中初睜開了他們微弱的眼睛，他們對着大地光明是何等的欣慕而跳躍啊！那時候遍地都是真人，沒有死灰木偶的混世派，沒有懷疑派哲學家，也沒有呻吟諷刺派文學家；沒有幽默，也沒有頹廢；所有的是跳躍、爭奪、戀愛、歡喜、與悲泣；——這些都是真的。他們在這種真生活中度過了幾千幾萬年，一直到各個整個的民族形成以後。在健全壯旺的民族裏，這種真的血仍然一直沸騰着。他們建立帝國，他們組織統一的政府，他們對外實行侵略。他們發展文化，他們戰爭，他們和平，他們活動，他們休息，總之一切都是真的。他們也有文學，是真誠壯旺的

文學；他們也有哲學，是素樸平實的哲學。在這個時代是「世紀中」的時代，蠻人的血正在沸騰到極點，沒有什麼人可以抵擋得住的，除非是另外一種蠻人。

過此以後，蠻人的血漸漸在每人的管中消耗盡了，民族也就漸漸老了。呻吟、太息、排擠、仇恨、等等的習慣漸漸成爲有力的發作了。對外的發展已經一變而爲對內的爭鬥。光明正大的決戰已經變爲陰謀挑撥，進取奮鬥已經變爲和平苟安，偉大的同情心已經變爲一色的嫉恨。他門有時殘忍，殘忍到蠻人所夢想不到的殘忍，也有時高談仁義、慈愛、和平、退讓等美德。他們的文學是嫉妬的文學，他們的哲學是讎怨的哲學，他們的人生觀是幸災樂禍的人生觀。一個民族到了這般地步，不必待別人的壓迫也就該亡定了。

與其說這種民族的退化是由於天時、地利、經濟、文化種種的影響，毋寧說是由於民族血管中蠻人的血漸漸消亡的結果。民族也和個人一樣，難免有老衰，老衰的原因是由於精力的銷磨，這種天然的淘汰作用是無可避免的。不過民族畢竟有和個人不同之處：個體的組織是進化以後的組織，每個機關都逐漸成爲固定的機能，一經老衰

就不易再恢復到青年的狀態；民族則不然，民族在未進爲近代完善的國家組織以前，他的結合很是鬆散固不待言，即以近代國家組織下的民族論，較之人類個體的組織也遠有自由變革的餘地；因此個人的老衰是無可救藥的，民族的老衰是尙可救藥的，歷史上的成例，每一種民族遇到了這種危機結果得救者，不出乎以下的幾種原因。

第一是新血的參加。近代醫學進步以後，對於衰弱的病人往往用接血的手術以助長其元氣，即是將壯旺人的血輸入病人血管之中，這樣可使病人得到了新的生力能毀和病菌繼續抵抗。在民族發展史上這種成例尤多，細分起來又有三種的區別。

甲是被征服式的。民族到了老衰，便失了對外抵抗的能力，這時候四圍若還有新的民族，富有蠻人的血的新民族，必定要向這老民族進攻的。進攻的結果必定是老民族的屈服。倘若這個新民族是組織和文化都較老民族高的完善民族，則老民族被征服以後只有走向種族絕滅的程途，再無自救的可能，古之迦太基，近代之墨西哥是也。倘若其中有幸運的，侵略的民族本身組織並不完善，文化並不高明，或者數量也遠不及老民族之多，則老民族在這種特惠的環境之下，未嘗無翻身之可能。有的緩過氣來，

將異民族一氣趕了出去，恢復舊日的狀態，而經過此一番刺激以後，轉將舊日惡劣的病原除去，恢復健康的氣色，這種與新血的參加無關，我們姑且不提。最幸運的，是不但將異民族的壓迫解除，並且翻過身來，一口氣將這侵入的異民族團圓吞下，細細咀嚼消化，使異民族的血逐一滲入舊有民族的血管，這種新血的融化，給將次老衰的民族以無限的利益，使他們的精力陡然發展，換了一番新面目。在歷史上如同羅馬人之接受日耳曼民族，中國人之接受五胡民族，都是這種方法之一例。不過這種方法畢竟是不光榮的，並且危險很多的，除非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兩者的文化程度相差過遠，是不會得到以上的結果的。

乙是吸收式的。這一種與上種適相反，是老衰的或將次老衰的民族自動的向外發展，接受新血的參加，以改變自己的老衰狀態。這種辦法在理想上是很完美的，不過事實上却很是少見。因為歷史上的民族有這種遠見的很少，並且民族到已經老衰以後，大家都已墮入一種短見苟安的心理之中，不但實際上無力進取，即有一二主張進取的分子也必為大多數所排斥牽制至不能有成而後已。只有在一種偶然的機遇上

或者會有這種結果，如同西羅馬帝國之僱傭日耳曼人爲兵，曹操之遷匈奴五部入塞，漢武帝之移東甌民族於江淮，西班牙之吸收摩爾人，普魯士之接受法國新教徒，唐朝之歡迎回教、景教、猶太教諸民族雜居內地。以上這幾種實例之中，只有普魯士的接受英法被壓迫的新教徒入境，是一種有計畫，有眼光的遠大舉動，結果普魯士得到絕大的利益；此外都只是一種偶然的機會。並且除漢唐兩朝的舉動無關重要外，其餘都是適當民族業已老衰之後，新民族輸入以後，不但不能同化，反生其窺伺之心，結果反蒙不利。不過若以較遠的眼光來看，則這種舉動畢竟是利多害少的。

丙是啓發式的。在同一家或同一民族散布一區域之中，因地位的通塞，人民的開化遲早也不同，沾染文化較遲的民族，畢竟是含有蠻血較多的民族，爲國家和民族的生命永久計，應當竭力讓這種富有蠻血的部分，得到適當的發展，則全體國民必蒙其福。近八十年來的中國，多半靠這些富有蠻性的湖南、廣東人來維持門面，這是人所共知的。

以上甲乙丙三項，都是就吸收新民族以挽救民族的衰頹而言，因爲舊民族的血

已經衰老，只有讓新血來參加是最有效的出路。不過我們要知道民族和個人畢竟有不同之處，個人的衰老是無可為力的，民族則尚可以人為力去起死回生。就歷史上的成例看來，民族的轉老還童往往可以借用以下幾種的政策去達到他。

甲是環境的改變。民族精力的豐吝和所處的環境是很有關係，一種老民族一旦遷移到一塊新地，就會變更了他的生活態度。保守的英國人搬到新大陸以後就會變成活潑的美國人，這是最顯著的例。

乙是訓練的得宜。民族也和個人一樣，不能全靠遺傳性去左右一切的，後天的教育和訓練也是很重要的。一種民族因為訓練的得宜與否，可以轉弱為強，也可以轉強為弱。強悍的蒙古人，因為受了喇嘛教的陶冶，可以變成奄奄一息的弱小民族。三十年戰爭後老大疲癯的德國，經過普魯士的軍國民訓練，遂造成近代的德國。倘若人為可以戰勝天然，則民族的衰老也未始不是可以挽回的了。

丙是刺激的猛烈。至弱的人在猛烈的刺激之下，不難一躍而超過於強健者，在民族中這種例更是普通的。一種民族在經過重大的刺激以後，往往可以矯正從前的

缺點。所以亡國之民總較未亡以前較有氣概，患難多的民族也較易覺醒些，不過這種患難刺激，是否個個民族都能經得住，受得起的？那就還是在未可知之天數了。

在衰老的民族中，倘若還希望返老還童，重使蠻人出現，則對於以上的一番研究不可不注意。

——長風第三期——

現 出 之 人 體

中國軍事史序

戰爭爲生物界主要現象之一，自有生物以來，即各有保存種族之本能，宇宙之舞臺有限，生物之滋生無窮，欲求個體及其種族綿延生存至於萬禩，勢不能不出於爭；則有勝有敗；敗者子孫滅絕，永爲宇宙之僂民，惟勝者始能爲世界之主人，此自然界森嚴之公例，非少數妄人所能以私意挽回，達爾文「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說，亦不過發明此公例之一部而已。動物不知合羣，故其爭限於個體，人類已進化至有社會組織之階段，其爭也以每一部落，每一民族，每一國家爲單位，大規模之軍事由此出焉。論者謂中國二十四史爲一部大相斫書，其實凡欲生存於此宇宙中者，孰能不由相斫之道？惟人類愈進化，則相斫之規模愈大，而需要內部之合羣互助亦愈亟，合羣互助之美德，乃爲備對外相斫而設，而亦只能由對外相斫而產生；故每一進化之國家民族，必有種種法令教條，禁止內部之相斫，以備集中精力，對外競爭。對外競爭愈烈，則內部合羣互

助之精神愈加奮發，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即此理也。中華立國五千餘年，所以倖未亡者，即由此種戰鬥之精神尙未樞亡淨盡之故。古稱黃帝七十征而有天下，可知黃族立國之始，即以戰爭爲主，與世界其他優勝之民族同；假使我黃祖當日不以師兵爲營衛，則漢族早已爲苗黎獯鬻之族所驅除矣。近千年來，中華民族因閉關日久而漸趨退化，和平、忍讓、大同、無抵抗種種邪說，乘時並起；內則有老莊苟安畏縮之哲學，外則有印度亡國餘孽之佛教，而博衣寬帶，坐而論道之陋儒，又從而煽之。以忍辱爲妙方，以退讓爲美德，以秦皇漢武爲罪人，以開邊拓土爲多事。宋明以降，此風愈甚，舉國淪於夷狄而恬不爲恥。清末受外患之甚深刺激，始稍稍有所覺悟，然未幾而故態復萌。歐戰以後，國人不察國際鬥爭之真相，妄以爲世界從此大同，相率準備作極樂世界之順民，一致反對軍國民教育，反對以武立國，甚至有公然倡全國廢止軍備之說者，其無常識可憐可笑一至於此。黃祖在天之靈當爲痛哭。彼不知人類賦生之始，即由至酷極烈之生存競爭而來，今日自命心胸廣大之舊儒新儒，當其父母媾精之初，均不過渺渺一精蟲耳，其倖而能由精蟲變化爲道貌岸然之人類者，由其入母腹後，努力鬥

爭，排除二萬萬兄弟輩之精蟲，犧牲二萬萬條兄弟之生命，而獨佔卵珠，始得倖而化爲人也。假使彼在精蟲時代亦持和平大同之主義，雍容揖讓，慈悲忍辱，學王道而不學霸道，則恐枕席未乾身已淪爲渣滓矣。嗚呼！今之大同哲學家，奈何弗思之。友人于君皇宮，撰中國軍事史，索序於余，余因述個人對於戰爭之所見如此。嗚呼！自韓非李斯以來，中國二千年中無此論矣。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國慶節前八日，常乃惠序。

現 出 之 人 體

從王光祈先生想到少年中國學會

昨天我在上海某報的啓事欄中，忽然看到一條追悼王光祈先生的啓事，才知道王先生死了，這不能不說是國難時期的中國的一個極大的損失。

提起了王光祈，現在青年中知道他的人恐怕很少了。因為他自從民國九年以後，就到了德國，一直到他死為止，他在德國整整住了十六年。這十六年來，中國屢次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的大變化，他都沒有親身參加過，在中國文化史上他可以算是一個隱士。無怪乎多數的青年已經忘記了他，然而在我們這些五四時代的青年回憶起來，他却是當時青年運動的一個最偉大的先鋒，近十餘年來的中國一切大變革，都不能說不受他的影響，因為他是首創「少年中國學會」的一個人。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運動以後一個新興的學術團體，是當時青年運動的中心，是後來中國一切革新運動的發祥地。五四運動的前身雖導源於新青年派和新潮派。

但因為這兩派的中堅分子，他們的眼光志氣不出於北京大學系統以外，他們的魄力，他們的公平廣大心，都够不上網羅領導全國的優秀青年，所以青年們才自己起來組織成一個少年中國學會，而王光祈先生便是這個學會的發起人，也是主持的人。

我記得見過王先生只一次，當時我還在北京高師當學生，少年中國學會約請陳獨秀先生在某處演講，我也去聽講，那一次是王先生當主席，剃得禿光的頭，樸素的衣裳，說了幾句簡單的介紹話，就下臺去了。從此以後，我再沒有見過王先生，也從沒有和他發生過私人的交誼。

少年中國學會在當時是一個純粹研究學術，並從事社會運動的團體，當時青年界中的優秀分子，差不多全網羅在內。他們所發刊的「少年中國」雜誌，是當時最富於生力，最有價值的雜誌。這個學會本有變為中國革新運動大本營的可能，不幸從民國十三年以後，因為國內政治社會的急劇變化，和大家思想觀點之不同，分化為若干派別，彼此互相讎視，甚至成爲正面的敵人。有的是國民黨，有的是共產黨，有的是青年黨，也有的專心學術，超然於黨派之外。在國民黨的，有周佛海等人，在共產黨的，有李大

鈞、鄧康、惲代英、黃日葵、毛澤東、劉仁靜、趙世炎、楊賢江、沈澤民、張聞天等人，在青年黨的，有左舜生、曾琦、李璜、陳啓天、余家菊等人，在新中國黨的，有康白情、孟壽椿等人（此黨早已解散），在學術及教育界專心研究，超然於黨派之上的，便是王光祈先生和周太玄、魏嗣鑾、田漢、宗白華、方東美、楊鐘健、吳俊升、邵爽秋、常道直、楊效春、謝循初等人。我們試把這十幾年來，中國政治上，思想上所發生的大變化統計一下，把其中領導和參加的著名人物檢點一過，就可以知道少年中國學會在中國新時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王先生從去國以後，就久住在德國，專門研究音樂，近年對於音樂的貢獻極多，又

以餘力翻譯關於外交文獻上的許多材料，也很有價值（以上著作大半在中華書局出版）。年來聽說有準備回國的意思，不知何故遲遲其行，竟致客死海外。最可惜的，是十餘年來專心研究的結果，竟無表現的機會，真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極大損失。

我和王先生素無交誼，也不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分子，但對於這位中國青年運動的先鋒的死去，却抱有莫大的哀意。國事茫茫，羣盜如麻，人間今是何世？王先生生居海外，死於國家未亡之前，不能不說是一個有福的入了。

現 出 之 人 體

——青年陣線第二期——

孟姜女哭長城

中國民間流傳的故事中，最普遍的是「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意義最偉大而深刻的，也莫過於這個故事。關於這個故事演變的來源，顧頤剛先生等已有詳細的考證，不必多費話，大抵這個故事的前身，就是孟子上「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的一段話。所謂長城本指的是齊的長城，但日久之後，這個故事由齊國傳到了北方各地，又間接而傳遍了全中國，於是齊的長城變成了秦的長城，而時代也由春秋移到秦始皇的時代了。

拿歷史上的舊題目來賦以新意義，用新的手法寫出來，這是現代中國文藝者的一條路徑。但孟姜女哭長城的這個故事，不需要再加什麼新意義，本身就含有很偉大深刻的思想。這個故事之所以能普遍流行，也就是因為她的本身能夠反映出民間的正確意識來，觸到了被壓迫民衆的痛點。我們可以說，這個故事，是由民衆自己產生的，

表現着在二千年來大一統專制的政治制度下，民衆對於統治勢力恨惡和反抗的積極意識。

在過去二千年大一統專制的局面之下，壓迫民衆的既不是帝國主義，也不是資本家，她是政治上的專制制度和把握這個制度的統治者。馬克司主義者把它叫做封建勢力，這個名詞用在中國是不妥的，因為封建勢力祇能指部分的割據勢力而言，中國封建制度自戰國以後就消滅了，從秦始皇以後，二千年來，中國是在大一統的專制社會之下，壓迫民衆的是專制勢力而非封建勢力，這個區別是不能含糊看過去的。

專制勢力之最淺顯的典型莫過於秦，故歷代談專制者多以秦爲例。孟姜女的故事故把背景放在秦始皇的時代是最適當不過的。秦始皇的修長城雖然在國族防衛的意義看來自有其價值，但從另外一種意義上看却是壓迫民衆的一個具體的好事例。文藝的描寫最好是要用具體寫法表現出抽象的意義來。文藝的描寫單位越具體，越能深刻動人。描寫專制勢力之剝削民衆，如果只用些苛捐雜稅等名詞或籠統的事實，是不能有深刻的印象的。一座長城，是一個很具體很具體的事實，在孟姜女的故事中，

這座城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專制勢力剝削壓迫民衆方法的總象徵，這個象徵是非常具體而有力的，任何無知識的民衆都能了解這個意義。而范杞梁的埋骨於長城之下，更具體顯明地表現出民衆犧牲於專制虐政之下的苦痛事實來。這個故事的意義很明白地，有力地，打入每一個被壓迫民衆的心坎中，這就是這個故事之所以能普遍流傳不朽的真正原因。

並且，這個故事的意義還不僅是消極的，不僅是單單訴出民衆的痛苦而已。它更進一步表現出一種對於專制虐政反抗的強烈情緒來。孟姜女是一個弱小的女子，她手無縛雞之力，不能對於秦始皇的虐政加以真正的反抗，但是她却有偉大的精神力，她以對於虐政的不平和自己身受的痛苦訴之於一哭。她的哭，是從精神深處發洩出來的偉大的具有反抗力的哭，她爲一切受壓迫者而哭，不僅爲自己和死去的丈夫而哭。她的哭是這樣偉大而強烈，所以她的一點淚能夠摧崩了象徵專制壁壘的萬里長城。

這是何等深刻的意識表現！這並不是我們的附會，在故事的本身中明明白白表

現着這個意義。

孟姜女故事之所以流傳不朽，就在她本身能够表現民衆的反抗虐政的強烈意識上。

現在的文藝創作者苦於無好題目，但是在我們的歷史上，神話上，和民間傳說上保留着無數的好題材等待着我們，爲什麼不去採集？

我希望文藝作家能够在最近產生一篇以孟姜女故事爲題材的長篇小說，或史詩，或其他的文學翹作品來，給我們文藝界開闢一個新方向。

——青年陣線第十三期——

蠻人之出現終

標商冊註

